

西北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陕西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活动研究（1696-1949）

---

姓名：冯建萍

---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

专业：历史学·专门史

---

指导教师：王静

---

20090601

## 中文摘要

方济各会是最早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修会之一，在陕西的天主教传播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后，方济各会传教士为了保证中国天主教传播工作的延续，领取了清政府颁发的“印票”，得以在中国继续传教。在陕西，方济各会取代了耶稣会在教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成为天主教在陕西传播的主要力量。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天主教陕西代牧区成立，罗马教廷任命方济各会士叶宗贤为首任代牧主教，方济各会全面接手陕西的传教活动，并将传教总堂设立在陕西泾阳鲁桥镇。“鸦片战争”后，方济各会凭借西方侵略势力和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条款”，抓住一切时机发展教务。“1862年的回民起义”、“1878年陕西特大旱灾”、“义和团运动”等特定历史事件，都为方济各会在陕西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利用这些机会，方济各会建立了高陵通远坊传教基地，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主教府，使之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天主教传教中心。在西安修建天主教南堂等传教场所，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入教，扩大了方济各会的影响。民国时期，陕西形成八大教区的格局，方济各会占据了汉中、延安、西安、整屋、凤翔、同州、安康和三原八大教区中，除了汉中以外其他七个教区的领导权。在传教过程中方济各会以“面向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坚持“清贫福音”的传教路线，与耶稣会传教策略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教特点使得方济各会在陕西的传教工作得以持续发展。

关键词：陕西 方济各会 传教活动 教区 清贫福音

## **The Research about Franciscan'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Shaanxi**

### **Abstract**

The Franciscan Order is one of the first the Catholic missionaries to China. It possess a vital status at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Shaanxi. The Franciscans Order replaced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become the monopoly power at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Shaanxi after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 It seizes every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Uprising Of Muslims in 1862 ", " The serious drought in Shaanxi Province in 1878 ", " Boxer Rebellion " and other historical events, both help The Franciscans Order to develop. The Franciscans Order set up a large scale missionary Tong Yuan Square base, Xi'an south Church and so on, has attracted many people to convert and expand the forces. There are the pattern of eight parish in Shaanxi during Minguo period. The Franciscan Order occupied the leadership of the Yan'an, Xi'an, Zhouzhi, Fengxiang, Tongzhou, Ankang and Samwon parish except of Hanzhong. The Franciscans Order and the Society of Jesus are very different in missionary method, because it carry out " For the general public who in bottom-oriented " and insisting " Poverty Gospels " at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This kind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anciscan Order contributed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missionary in Shaanxi.

**Key Words: Shaanxi, the Franciscans Order, Missionary activity, the Diocese, the Poverty Gospels**

##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

本人完全了解西北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北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或其它相关数据库。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冯建萍 指导教师签名： 王静  
2009年6月10日 2009年6月10日

---

##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冯建萍  
2009年6月10日

## 绪 论

### 一、研究内容与意义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多个民族和多种文化的聚集融合之地，许多外来宗教都曾经传入这里，并以此为中心扩散传播至全国。在天主教来华传教的历史上，陕西是最早开教的地区之一，方济各会则在陕西天主教传播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是欧洲最古老的天主教修会之一，对欧洲社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同时，方济各会也是与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并列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三大修会之一。1209年，意大利阿西西城富家子弟方济各(Franciso Javier, 1181-1226)得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ius III)的批准成立该会，会士间互称小兄弟，故又名“小兄弟会”。1226年，方济各会分裂，形成守规派、住院派、嘉布遣派三个小兄弟会，每个派别都自称为方济各会。<sup>①</sup>

蒙元时期，方济各会已开始来华传教。1245年，罗马教廷派遣方济各会会士柏郎嘉宾(Giovani de Piano Carpini, 1180-1252)出使中国。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方济各会会士孟高维诺(Giovani da Mentecorvino, 1247-1328)以教皇特使的身份，获准在中国传教，把罗马天主教传到中国。1307年(元大德十一年)，罗马教廷任命孟高维诺为汗八里(今北京)总主教，他是天主教在华第一个教区的创始人和首任主教。当时天主教在今内蒙古、新疆、江苏、浙江、福建、陕西等地都有活动，由于信徒大多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在中国内地的汉族民众中没有根基，所以随着元朝的覆灭，天主教在中国也销声匿迹了。

16世纪，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和西方国家殖民活动的开展，天主教的海外传教事业发展起来，天主教的各个修会开始来华传教，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从明中叶起，天主教除了方济各会外，相继来华的还有耶稣会(1562年)、多明我会(1631年)、奥斯定会(Augustinian Order, 168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 1682年)、遣使会(Lazaristes, 1785年)、米兰外方传教会(Pontifical Institute Foreign Missions of Milan, 1815年)等修会组织。<sup>②</sup>其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一直占据着中国传教活动的主导地位。明清之际，由于天主教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再加上西方殖民国家对传教区领导权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导致了长达百年的“中国

<sup>①</sup> 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sup>②</sup> 郭葆天：《中国天主教史纲》(下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984年版，第71页。

礼仪之争”。这场争论最终发展成罗马教廷和中国皇帝之间的政治冲突。导致清政府规定西洋传教士必须领取“印票”，<sup>①</sup>并做出“永在华传教，不再返回西洋”的保证，才能在中国继续传教。方济各会会士为了保持传教活动的延续，顶着罗马教廷的压力，领取了清政府颁发的“印票”。耶稣会在这场争论后，失去了教皇的支持，在华势力大减。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在中国新划分九个代牧区分管中国教务，陕西代牧区正式设立，任命方济各会传教士叶宗贤(Basilus Brollo)为陕西代牧区首任代牧主教。自此，方济各会全面接管耶稣会在陕西的教务，从而改变了此前耶稣会独自操控陕西传教区的局面。方济各会入陕后，在泾阳县鲁桥镇设立天主教总堂，开始传教活动。后在高陵通远坊修建主教府，成为当时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还修建了修道院、修女院等宗教机构，使通远坊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天主教中心。方济各会入陕后不但把持着陕西教务，还兼管西北五省教务及负担湖、广(湖南和湖北地区，笔者注)<sup>②</sup>的传教责任，所辖地区大约有十省之多。<sup>③</sup>陕西成为方济各会在中国进行天主教传教工作的大本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方济各会自从1696年进入陕西进行传教活动，直至1949年从未间断。因此，对陕西天主教方济各会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时期方济各会在陕西活动的情况及其对陕西社会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天主教传播史的研究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 二、研究现状

有关天主教来华传教活动的著作可谓浩如烟海，其中重要的有：近代徐宗泽所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sup>④</sup>，全书约18万字，从开封犹太教谈起，到唐元景教、明清以至20世纪30年代天主教，书中对方济各会来华传教活动多有涉及，该书堪称中国天主教通史的代表作；方豪先生的著作《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sup>⑤</sup>，以传记体形式介绍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涉及的人物从唐代至20世纪中叶，时间跨度1500年，其中就有方济各会传教士在华传教的珍贵资料；还有《中西交通史》<sup>⑥</sup>是从中外文化角度阐述天主教传教史；《陈垣学术论文集》<sup>⑦</sup>(一、二集)是陈垣先生充分利用书画题跋、诗文碑传、家谱碟片等资料进行研究的成果，其中收录有关天主教研究的著作是重要的参考文献。

<sup>①</sup> “印票”：由清政府内务府颁发批准西洋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执照，用汉、满文印有：“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回复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的字样。

<sup>②</sup> (荷)金普斯、麦克罗斯基著，李志忠译：《方济会来华史(1294-1955)》，香港方济会，2000年版。

<sup>③</sup> 陕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

<sup>④</sup>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

<sup>⑤</sup>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

<sup>⑥</sup>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院，1987年版。

<sup>⑦</sup> 陈乐素、陈智超编：《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到了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西文化再次碰撞,关于天主教来华史的研究成为热点。1981年,顾长声先生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sup>①</sup>问世,书中系统论述了自鸦片战争至1949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情况。以“传教士依托和推行列强侵略政策”为主线,引用了大量的传教士论著、传记和外国人写的传教史,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参与军事、外交、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进行了论述;顾卫民先生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sup>②</sup>是从社会史的角度阐述教会历史,注重基督教与中国本土社会与文化相互沟通、适应与融合的问题,对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于传教士也给予了客观的评价,既指出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之下强行进入中国的事实,又客观评价了他们在西学东渐及维新、改革中起的积极作用。这两部著作对本文写作思路有很大的帮助;1998年出版的李天纲著作《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sup>③</sup>,在中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由来、发展以及对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影响作了深刻的分析,为本论文在论述方济各会来陕的历史背景提供了许多可参考的资料;2001年,汤开建先生发表的论文《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sup>④</sup>是中国历史学界关于方济各会来华传教活动的一篇重要论文,概述了方济各会传教士明末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活动和在山东开教的经过,并且整理出一份入华方济各会传教士名单,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此外,2003年汤开建先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清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兴衰》<sup>⑤</sup>叙述了清顺治、康熙时期天主教在中国公开传播和发展,以及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禁教期间天主教在中国秘密传播的情况,对各个时期天主教各修会在华所建教堂、传教士和教徒数量、各修会传教区域的分布进行了论述,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的资料;2004年崔维孝的博士论文《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研究(1579-1732)》<sup>⑥</sup>系统详细地介绍了不同时期方济各会在华传教活动情况,对本文的写作有极大的帮助。

关于陕西基督教的研究成果主要有:2007年出版的《基督教与陕西》<sup>⑦</sup>,该书从陕西基督教发展的背景、基督教在陕西的发展沿革及基督教对陕西社会的影响三个方面论述了陕西地区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并以宗教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为线索,论述了

<sup>①</sup>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sup>②</sup>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sup>③</sup>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sup>④</sup> 汤开建:《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载自《相遇与碰撞——纪念利马窦进京4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宗教出版社,2003年9月。

<sup>⑤</sup> 汤开建:《清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兴衰》,载自《国际汉学》第9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

<sup>⑥</sup> 崔维孝:《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研究(1579-1732)》(博士论文),暨南大学,2004年12月。

<sup>⑦</sup> 王哲:《基督教与陕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基督教在文化、社会等方面对陕西的影响。通过考察近代以来基督教在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慈善福利、改良风气等方面的社会活动，揭示了基督教作为正统宗教所具有的文化传播、社会平衡及社会教化功能及其在陕西社会文明进程中所发挥的客观作用。同时，作者对在陕西进行传教活动的方济各会做了侧面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张晓虹著《陕西天主教教区的初步研究》，论述了陕西教区的发展沿革，脉络清晰，条理分明，对本文的写作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 三、研究史料及文献

#### 1. 档案

历史档案记载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涉及方济各会来陕活动的历史档案有：中国第一档案馆编纂的《清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该书所收档案共 1230 件，时间从顺治元年(1644)至道光三十年(1850)。档案的种类包括皇帝的亲笔朱谕和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谕旨、官员的奏折和题本、官衙之间的咨呈文书及传教士敬献的礼品清单，传教士所奏折等，涉及当时在华天主教各个方面的情况，是本文参考的重要史料。《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是 20 世纪 20 年代基督教会所作的调查成果。书中介绍了 20 世纪初中国国内经济、人口、交通、宗教状况，并且分 19 个省区逐一介绍了各省区的省志、人口密度、基督教宣教地、工作历史、布道范围、基督教职员、受餐信徒及教会学校和医药事业。此书不仅是了解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了解 1921 年前天主教在中国活动的重要资料，文中有涉及到天主教不同修会的情况，包括方济各会在不同省份的活动情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出版的《教务教案档》，将基督教来华传教的资料和各地教案的记录汇总编纂而成，是重要的史料来源。陕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纂的《陕西省民族志·天主教部分资料》（内部资料）、西安市档案馆存《西安天主教会调查报告》，以及陕西省政协存《陕西天主教历史汇编》等资料，提供了大量方济各会在陕西活动翔实、可靠的史料，为本论文的写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 2. 地方志

地方志是记载某个特定地区自然、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其区域性特点是研究地方历史变迁不可缺少的史料。本文采用了民国时期编纂的《续修陕西通志稿》、《宁羌州乡土志》等资料和当代出版的 24 部县志，从中获得了天主教传入陕西各县的具体时间以及大致发展情况，地方志中对天主教在各县的活动如教案、赈灾、办学等情况都有记载，是研究天主教对近代社会影响不可或缺的史料。



### 3. 外文史料和著作

关于方济各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外文史料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等国家。其中重要的有1929年西班牙方济各小兄弟会编辑出版的《方济各会士中国书简汇编》，它是一套反映了西班牙和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入华传教历史的文献丛书，从1929年出版第一卷到1997年，一共出版了10卷，所汇集的文献主要是方济各传教士撰写的传教报告和信件，还有编辑人员写的一些史料概述和传教士生平简介。《方济各会士中国书简汇编》所汇集的史料，对本论文外文资料的使用有极大的帮助。方济各会士金普斯、麦克罗斯基合著，李志忠翻译的《方济各会来华史》<sup>①</sup>论述了方济各会从1294年到1955年在中国传教的历史，以编年体的形式概括介绍了方济各会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汇集了方济各会在华各个地区传教的具体情况，提供了大量方济各会在陕西活动有价值的资料。意大利学者柯毅霖著、王志成翻译的《晚明基督论》，<sup>②</sup>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天主教方济各会与其他修会的传教方式和策略进行了比较，并深刻分析了两种文化产生的融合和碰撞。1930年，英国人阿·克·穆尔(Arther Christopher Moule)出版了《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sup>③</sup>将早期有关在华基督教的中西文资料译成英文，叙述了中国早期基督教从635年(唐贞观九年)到1550年(明嘉靖二十九年)共900多年的历史，内容包括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和1294年传入的天主教方济各会。该书以史料见长，并附有大事年表和专名索引。还有法国沙百里的《中国基督徒史》，<sup>④</sup>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sup>⑤</sup>等著作，都从不同的方面涉及到天主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的一些情况。其他还有一些关于天主教在华活动的文献资料，如《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是由来华基督教会创办，影响较大的英文期刊，代表了当时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和观点等。

### 四、研究思路及目的

方济各会作为来华传教的天主教第二大修会，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从中国学界已经出版的研究中国天主教来华传教历史的书籍和论文来看，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是从整体上对天主教来华传教活动进行评述，或是对耶稣会进行专题研究。有关近代天主教在华传教历史的著作，从全国角度进行综合性论述的比较多，从区域角度研究具体修会传教的情况则较少。尤其是对方济各会来陕西传教的专题研究显得更加匮乏。

<sup>①</sup> (荷)金普斯、麦克罗斯基合著，李志忠译：《方济会来华史》，香港天主教方济会，2000年版。

<sup>②</sup> (意)柯毅霖著，王志成翻译：《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sup>③</sup> (英)阿·克·穆尔著，郝振华译：《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

<sup>④</sup> (法)沙百里著，耿昇译：《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sup>⑤</sup>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乏，缺少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成果。

本论文以时间线索为脉络，对鸦片战争前（1840年以前）、鸦片战争以后（1840-1911年）至民国时期（1911-1949年），天主教方济各会在陕西地区的活动加以论述。对方济各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力图得出一个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认识。文中叙述了方济各会入陕前，陕西天主教的发展概况，方济各会来陕西的历史背景及原因，论述了陕西代牧区的成立，通远坊的建立和方济各会在“陕西回民起义”、“1878年陕西旱灾”、“义和团运动”等历史事件中的活动情况，以及民国时期陕西教区发展的情况，方济各会对陕西社会的影响等内容，最后部分总结了方济各会的传教策略与特点。

本文首次对方济各会在陕西的传教活动进行专题研究，在历史文献分析考证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调查对方济各会在陕西的传教活动进行论述。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挖掘、整理有价值的史料，结合社会学调查方法，取得相对丰富的口述资料，对相关地点进行实地考察，使文章的论述更为准确和客观。方济各会在陕西天主教传教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陕西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希望本专题的研究能够对陕西天主教史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 第一章 方济各会入陕前天主教在陕西活动概况

### 第一节 明代以前天主教在华传播概述

天主教(Catholicism)也称“公教”、“罗马公教”,有时也称“旧教”,以区别基督新教,与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sup>①</sup>1582年(明万历十年),以利玛窦神父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将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并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至高莫若天,至尊莫若主”的观念,把至高的万物之造物主翻译为“天主”,并把这一教会在中国称为“天主教”。天主教前身是基督教创立初期存在于罗马帝国西部拉丁语地区的西派,因为是以罗马为中心,所以也称罗马公教。西罗马帝国476年灭亡前后,罗马主教逐渐成为整个西派的领袖,西派教会逐渐形成教皇体制。1054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后,西派自称公教(即天主教)。天主教有一套等级分明的教阶体制,以教皇为其最高首领,罗马教廷作为中央行政机关协助教皇进行训导和治理教会的工作。中世纪时,天主教成为西欧各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并把哲学、政治、法律等都置于天主教神学的控制之下。曾设置异端裁判所、组织十字军东征。16世纪欧洲各国相继爆发宗教改革运动,否认教皇权威,天主教在欧洲逐渐丧失了统治地位。面对宗教改革的强大冲击,天主教以修会为工具抵制宗教改革运动,除了本笃会(Benedictine Order)、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奥斯定会(Augustinian Order)等传统修会,还兴起新型修会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等,其中耶稣会影响最大,是罗马教廷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有力武器,该会仿效军队编制,纪律森严、机构严密,会士既从事宗教活动,又参与政治斗争。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大部分是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活动非常成功。“中国礼仪之争”后失去教皇支持,在华势力衰落。多明我会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创立于法国,是欧洲的神学权威,注重布道活动,提倡学术研讨,传播经院哲学。该会曾受教皇委派,主持“异端裁判所”,和方济各会一起向耶稣会发难,挑起“中国礼仪之争”。

明代以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时代主要在唐代和元代。<sup>②</sup>唐代,传入我国的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中国文献中称为“景教”。1625年(明天启五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郊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表明早在唐朝初年,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就已

<sup>①</sup> 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第8页。

<sup>②</sup> 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第69页。

经进入中国，并在陕西关中地区开始传教活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体为黑色，顶端是金字塔形，镌刻着花式十字架，下面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大字，排列成三行，碑体正面和侧面刻满了汉字，在碑体的右下方还用古叙利亚文刻有教士的姓名。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提供了基督教早在唐代即传来中国的确凿证据，碑文的内容分为序言和颂词。序文简略地说明了景教的基本信仰，叙述了景教自唐太宗传入中国后受到太宗以下历代皇帝的优待扶持，一百五十年间的发展经过；颂词则是用韵文再次概括地讲述了序文的内容。公元 845 年，唐武宗李炎下诏灭法毁寺，即史书上所说的“会昌灭法”，虽然主要针对佛教，但景教也受到株连。980 年（宋太平兴国五年），一位叫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曾遇到名叫奈吉兰的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问及他在中国考察教务的情况，发现教堂毁坏，教徒全无，寻遍全国，竟没有一个可以授教。<sup>①</sup>由此可见，基督教在华传教的第一阶段的历史基本结束。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本土逐渐灭绝后，在中亚和北方的蒙古、回纥等民族中仍然盛行。蒙古境内的三大部落克烈、乃蛮及汪古部都信奉景教。成吉思汗在统一的过程中，采取对一切宗教宽容的政策，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景教也重新回到了内地。蒙古在征服欧亚大陆的过程中，将大量西亚和东欧的基督徒带到了中国内地，基督教又得以在内地再次传播。元代人将基督教各派统称为“也里可温”，这是蒙古语的译音，意为“有福气的人”。蒙元时期政府对各民族的宗教采取的是宽容的政策。意大利著名旅行家、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马可·波罗记载，不管是基督徒、回教徒还是佛教徒的重大节日，元朝皇帝忽必烈都要前往行礼。他还说到：“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人有四，基督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穆罕默德），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最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sup>②</sup>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从喀什葛尔到北京一带，到处都有景教教徒。在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福州、杭州、镇江等地也广泛的分布着景教教徒和教堂。1275 年（元至元十二年），在汗八里（今北京）设立了景教总主教管辖区，仅此一地就有景教徒 3 万余人。<sup>③</sup>1289 年，元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基督教机构：崇福司，最为兴盛的时候数量达到了 72 所。由此可见，基督教在元代有了比唐朝更大规模的发展。

<sup>①</sup>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 232 页。

<sup>②</sup>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 305 页。

<sup>③</sup>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院，1987 年版，第 539 页。

元代，除景教外，天主教在中国也开始传播。罗马教廷于 1245 年派遣方济各会会士意大利人柏郎嘉宾出使蒙古都城和林，他从法国里昂出发，经捷克、波兰、俄罗斯、沿第聂伯河、黑海，于 1246 年夏抵达蒙古钦察汗国，在伏尔加河上游东岸的萨来城晋见拔都。随后到达和林，正值贵由汗（元定宗）即位，于是他参加了新君的登极大典，递交了教皇文书。同年冬天携带定宗的回复书信返回欧洲，受到教皇的嘉奖。1253 年，法国方济各会会士鲁布鲁克（Gullaume de Rubrouck, 1215-1270）拜见蒙古汗，受到礼遇。他回到欧洲后将其东行经过写成《游记》，描述其沿途见闻还有关于景教在当地流传的情况。1294 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约翰·孟高维诺以教皇特使的名义抵达汗八里（今北京），得到成宗接见，并获准在京建立教堂传教，这是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开始。<sup>①</sup>1299 年，孟高维诺在北京城内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堂，1305 年又在皇宫附近修建了另一天主教堂，此堂可以容纳 200 人，两座教堂相距大约 2 公里。孟高维诺从 1298 年到 1318 年期间，替 600 多人施洗。孟高维诺还劝化了汪古部首领高唐王阔里吉思脱离景教，改信天主教，他的儿子由孟高维诺施洗，教名为约翰。高唐王率其封地的民众都信奉天主教，还捐资建造了一所教堂，亲自题写匾额为“罗马教堂”，并亲自在教堂里担任职务。孟高维诺还收养了 150 个外教人家的男孩，年龄是七岁至十一岁，给他们施洗，教他们学习拉丁文和教会礼节，并且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唱经班和歌咏队。他用蒙古文译出 150 篇《祈祷文》，30 多篇《诗篇》、《圣歌》，每逢礼拜，就组织他们在教堂中歌唱，还到宫廷里为皇帝、贵族表演，得到了皇帝的赞许。<sup>②</sup>孟高维诺在北京 12 年中，将圣经翻译成蒙古文进行传教，到 1305 年一共发展教徒达到 6000 余人。<sup>③</sup>1307 年，罗马教廷任命方济各会士约翰·孟高维诺为汗八里总主教。他是天主教在华的第一个教区创始人和首任主教。1322 年，另一位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传教士和德理（也译为鄂多立克，Friar odorac of Pordenone, 1265-1331）到了中国，他在泉州登陆，后来取道福州、杭州、南京、扬州、沿着黄河，到了北京，他一路上考察各地教会情况，后来在北京停留了大约三年时间（1325-1328），在此期间劝化了许多人信奉天主教。1328 年，接受高唐王阔里吉思的邀请，从北京出发，先后游历了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后沿丝路古道返回欧洲。他请求教皇派遣五十个教士同来中国传教，但是他在到达意大利的第二年（1331 年）即去世了，因而愿望没有实现。他曾口授其东游见闻，留下《和德理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此后传教士来中国的陆续增多，除了北京外，天主教

<sup>①</sup> 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第 69 页。

<sup>②</sup>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 320 页。

<sup>③</sup>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 321 页。

在泉州、内蒙古、新疆、江苏、浙江等地都有活动，天主教信徒达到6万人，<sup>①</sup>多为蒙古人、阿兰人<sup>②</sup>和色目人。1328年（元天历元年）约翰·孟高维诺在北京去世。教皇在1333年又任命尼古拉为汗八里的新主教，他也是方济各会会士，但他在来华的途中不知所终，中国天主教总主教职位一直无人接替，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呈现衰落趋势。后来教皇也曾派遣了方济各会会士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Nicholas)来华任主教职位，但中途不知去向。1336年（元至元二年），元顺帝派使团去教廷，使团一共16人，由泉州主教安德鲁率领15位传教士代表组成，目的有两个，一是求购西方良马，一是希望教皇继续派遣继任主教。1338年，元朝使团抵达阿维尼翁(Avignin)，受到教皇本笃十二世(Benedictus XII, 1285-1342)接见，教皇立即筹组以方济各会会士马里诺利(John of Marignolli)为首的使团出使元朝。使团于1342年来到中国北京，晋见元顺帝，把教皇所赠送的战马和礼物书信献上，得到了元朝皇帝的欢喜。1345年，马里诺利起程回欧洲，取道马刺甲、锡兰、耶路撒冷等地，于1352年到达阿维尼翁向教皇复命，陈说有继续派遣教士到中国的必要。教皇虽然后来曾经先后派过三个主教：1362年的多默(Tomasso)，1370年的伯拉多(Prao)，1426年的雅各布(Capua)，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到任，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由此停顿。

元代基督教在陕西地区也有传播。有关记载的石碑分布在陕西的凤翔、周至、长安、韩城、合阳等地，年代跨越1238年（太宗十年）到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内容都是关于元代皇帝颁发的蠲免租赋差役的圣旨。<sup>③</sup>现存于陕西户县祖庵镇重阳宫的元代石碑也有关于也里可温活动踪迹的记载。《元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条记载陕西的官员上书皇帝，指责也里可温教徒利用经商特权夹带其他商人逃避税收。由此推断，当时在陕西的景教教徒大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据《高陵县志》<sup>④</sup>记载1328年（元泰定五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和德理（前文提到）奉汗八里总主教孟高维诺的命令来到陕西三原、高陵一带传教，发展教徒千余人。

蒙元时期，来华方济各会士的传教活动使天主教堂和十字架散布在汗八里到中亚、西亚的广大地区。但是由于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对象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向汉族民众传教的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天主教传教活动紧紧依附于元帝国的政治势力，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中真正生根。因此，它随着元朝的兴盛而发展，跟着元朝的覆灭而绝迹，

<sup>①</sup> 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第69页。

<sup>②</sup> 阿兰人，西亚民族之一。西汉称奄蔡，三国时称阿兰。分布于今咸海至里海一带，从事游牧。

<sup>③</sup> 蔡美彪编：《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sup>④</sup> 高陵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高陵县志》，西安出版社，2000年版。

基督教在中原的传播再次中断。

## 第二节 耶稣会在陕西活动情况

十五世纪以来,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新航线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也开始到海外传播天主教,耶稣会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是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de Loyola, 1491-1556)创建于巴黎,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Paulus III)正式批准成立。以“绝财、绝色、绝意、绝对效忠教皇”为宗旨,<sup>①</sup>要求会士既从事宗教活动,又参与政治斗争,深入世俗生活,加强与各阶层的联系,尤其是与上层社会建立联系,积极向各国统治集团渗透,扩展势力,对社会政治生活施加影响。

1535年,葡萄牙国王与耶稣会会长罗耀拉商讨传教事宜,根据教皇子午线划分,亚洲属于葡萄牙殖民地,因此葡萄牙负责在亚洲的传教事务,亚洲远东教务由耶稣会负责。最后决定派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前往亚洲传教,沙勿略在出发前接受了教宗钦使的名义,及视察东方葡属教务的使命。他从里斯本出发,于1549年入日本,后转向中国,因明朝的闭关自守政策使他在广东南部的上川岛上等待,1552年病逝于此。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留居澳门后,耶稣会又以此为根据地,向远东传教,特别是寻找进入中国大陆的机会。1582年8月7日,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抵达澳门,1583年夏,他随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 1543-1607)至中国广州,从此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不断。随着日本教务的发展,耶稣会成立日本-中国会省,主持东亚传教事务。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中国教省成立,由耶稣会管理两广和澳门之外中国传教事务,<sup>②</sup>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 1559-1654)任会长。由于中国地域广大,耶稣会将中国传教区分为华北和华南二区,华北区包括京畿、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四川,命傅汛际(Furtado Francois, 1587-1653)任会长;华南区辖南京、福建、湖广、浙江、江西、两广,命艾儒略(Julio Aleni, 1582-1649)为会长。<sup>③</sup>1658年,罗马教廷为了避开葡萄牙的干预,设立中国南京宗座代牧区,教廷任命法国人高多伦第(Ignatius Cotolendi)为南京代牧主教,此举遭到葡萄牙国王的抗议。迫于压力,罗马教廷于1690年撤销南京代牧区,改建北京、南京主教区,仍归葡萄牙管理,陕西隶属于北京主教区。1696

<sup>①</sup> 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第14页。

<sup>②</sup>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66页。

<sup>③</sup>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57页。

年（康熙三十五年），罗马传信部在中国新设立 9 个宗座代牧区（简称代牧区）分管中国教务，陕西代牧区正式成立，其辖区还包括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

耶稣会开始在陕西传教，缘自陕西天主教第一人——陕西泾阳人王徵。因为他信仰基督，于是呈请北京的传教总会派遣教士来陕西开教，1625 年（明天启五年）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神父入陕西，来到王徵的家乡泾阳，在其家中设堂传教。自此，天主教耶稣会开始在陕西传教。

金尼阁，字四表，耶稣会比利时籍传教士，他于明末两次来华，在基督教来华传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于 1625 年到达陕西，编纂了一部汉语教科书《西儒耳目资》，目的是帮助西方传教士克服语言障碍，为学习汉语提供便利，该书对中国音韵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后来，金尼阁在王徵的陪同下来到西安，恰逢著名的《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陕西出土，金尼阁便成为最先看到此碑的西方传教士。他对此碑进行了研究，并考订了李之藻关于此碑的注释，将碑文翻译成拉丁文字寄给罗马教廷。在陕期间，金尼阁还创办了一所印书铺，“所印汉文书籍甚多，拉丁文书籍亦有数种。”<sup>①</sup>1627 年，金尼阁离开陕西。

不久，另一位耶稣会士德国人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奉命来到陕西西安接管教务。当时，传教士在陕西还没有固定的居住和传教场所，汤若望就在王徵的帮助下募集资金，修建了一所教堂，这所教堂就是西安城北糖坊街天主堂（北堂）的前身。从此，天主教在陕西有了稳定的传教场所。王徵将这所教堂命名为“崇一堂”，取自天主教“十诫”之首“钦崇一天主在万物之上”的意思。汤若望在西安期间积极从事各种传教活动。崇一堂开堂之日，有 50 人受洗入教。<sup>②</sup>汤若望在陕期间使得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播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他本人也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工作，他计算确定了西安的纬度，还观测到了 1628 年 1 月 21 日的日食。<sup>③</sup>1630 年，汤若望征诏入京参与编纂《崇禎历书》，陕西的官员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向汤若望表示祝贺，为他饯行。由此可见汤若望当时在陕西已获得了一定的威望。

1628 年，另一位耶稣会士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usde Semedo, 1558-1658）随王徵来到陕西西安。他在陕西期间修建了教堂，并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他将碑文翻译成葡萄牙文并加以注释，附在他所出版的中国教务报告中。由于此书有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等多个译本，所以影响

<sup>①</sup>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 90 页。

<sup>②</sup>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上列传及书目》，第 169 页。

<sup>③</sup> 李兰琴：《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1995 年版，第 78 页。



很大，从而引发了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研究热潮。他还撰写了《大中国志》，向欧洲人进一步全方位的介绍中国，对中学西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书中还介绍到了陕西，提到陕西盛产的农作物，在陕西发现的基督教遗址，在西安有教堂，有教徒聚会的礼拜堂，基督教在陕西有良好的基础，传教工作富有成效。金尼阁、汤若望、曾德昭等耶稣会士的传教工作使天主教在陕西生根发芽。

后来相继来到陕西的耶稣会士还有傅汛际（Franciscus Furtado, 1587-1653）、方德望（Stephanus Faber）和杜奥定（Agustin Tudeschini）等人。傅汛际，葡萄牙人，1630年-1634年在陕西传教，曾在西安建造教堂，后来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华北区主教，负责管理包括京畿、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在内教区的教务工作。<sup>①</sup>杜奥定，意大利人，1637年-1639年在山西、陕西传教。1638年在西安府为400人授洗，第二年受洗入教的人数更多，共有1240人。<sup>②</sup>他还根据自己来华时的经历写成《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这是关于17世纪海上交通的重要历史文献。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耶稣会比利时籍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来到陕西。他在陕西工作了10个月，后经汤若望推荐被朝廷征召入京，编纂历法。1660年，北京发生了“历狱”，天主教受到了打击。南怀仁用事实证明了西历的准确性，赢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使受到影响的天主教传教活动逐渐恢复。在南怀仁等在朝廷效力的传教士们的努力下，康熙对天主教十分优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第一次获得了公开传教的自由，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至1664年（康熙三年），耶稣会在华共发展教徒24.6万人，<sup>③</sup>其中陕西有6万余人（西安府2万余人，汉中府4万余人）。

④

1696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将中国划分为12个教区：一、澳门区，管两广；二、南京区，辖江南及河南；三、北京区，直隶、山东、辽东属之；四、福建区；五、云南区；六、四川区；七、浙江区；八、江西区；九、湖广区；十、山西区；十一、陕西区；十二、贵州区。前三区为主教区，后九区属代牧区。<sup>④</sup>陕西代牧区正式成立，罗马教廷将陕西传教事务交由方济各会管理，并任命方济各会会士叶宗贤（Basilus Brollo）为陕西代牧区第一任主教。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罗马教廷撤销耶稣会，耶稣会管理的区域由其他修会接管，耶稣会在陕西的传教活动告一段落，方济各会全面接手陕西教务。

<sup>①</sup> 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第222页。

<sup>②</sup>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21页。

<sup>③</sup> 任继愈：《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7页。

<sup>④</sup>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38页。

<sup>⑤</sup>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28页。

## 第二章 方济各会在陕西初期传教情况（1840年前）

### 第一节 方济各会的历史源流

方济各会的创始人是方济各（Francisco de Assisi, 1181-1226），生于意大利阿西西城（Assisi），他去世后被教皇封为圣徒，所以又称他为“圣方济”。“方济各出身富贵，但是为了做一个贫穷的游方传教士而离弃他的财富。”<sup>①</sup>他曾参加过战争，后来大病一场，痊愈后，幡然悔悟，决心补赎自己的罪孽，遵照主的嘱咐，不带钱袋，不带鞋和拐杖，出外宣讲天国的福音。自1205年起，方济各与另外三名志同道合的朋友以组织一新修会为号召，身穿粗布长袍，手托乞食钵，赤足行走，先后前往西班牙、摩洛哥、法兰西，后来又回到埃及和叙利亚等地宣传基督教信仰<sup>②</sup>。

方济各回到欧洲后，开始致力说服基督徒按照《圣经》教训和范例，实行基督的生活。<sup>③</sup>1209年，方济各终于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ius III）批准，创建了“方济各乞食修会”。以贞洁（Chastity）、听命（Obedience）和清贫（Poverty）为根本戒律，会规规定：方济各会的宗旨是传播和宣讲福音，会士要遵守福音教训，麻布赤足，过基督之贫困生活，步行各地传播“清贫福音”，会士之间以小兄弟相称，所以方济各会又称为“小兄弟会”。提倡兄弟般友爱的生活，每个人都保有他的尊严和独特性，大家都有责任维护修会的荣誉。会士在入会前，要放弃一切财产，将所有施舍给穷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方济各会建会初期，规定会内不置恒产，会士以托钵乞食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规渐渐宽松，有些方济各会士在城市中建立住院，积聚大量财产，内部为此意见不一，引起纷争，从而分裂为守规派、住院派、嘉布遣派三个支派，都自称方济各派。到了十六世纪在欧洲，方济各会拥有教徒达到165000人，成为欧洲势力最强大的修会。

④

方济各会把城镇作为他们的活动地区，因为在城镇活动，可以很快建立会院，有正常的生活供应，不必仅仅依靠不固定的施舍，这样他们便可以以会院为基地，外出传播和宣讲福音。方济各会的各派都有为女修道者设立的“第二会”制度，这是方济各的同乡女子克拉拉创建的，又称克拉拉会，后也分裂成数派。该会提倡过严格的苦行僧般的隐修生活，生活来源得自于教徒的自动捐献。方济各会还为在俗的教徒设有“第三会”

<sup>①</sup>（美）马可·泰勒编，李云路等译：《简明基督教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sup>②</sup> 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第169页。

<sup>③</sup>（美）GF穆尔著，郭舜平等译：《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6页。

<sup>④</sup>（意）柯毅霖著，王志成等译：《晚明基督论》，第16页。

制度，这对方济各会的发展和扩大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个制度允许信徒不必放弃家庭，不必放弃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他们可以在修会神甫的指导下，尽力过福音式生活，教导他们应避免世俗的享乐，广为布施财产，培养宗教的精神。方济各会进入中国传教后，也将第三会制度带到了中国。

方济各会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蒙元时期，1206年蒙古政权建立之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便开始了向西方世界的扩张，并取得节节胜利，欧洲各国陷于一片恐慌之中。面对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欧洲各国的君王和民众都把希望寄托在罗马教皇的身上，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ius IV*）曾多次呼吁欧洲各国联合抗敌，但各国君王因惧怕强悍的蒙古军队，无人响应。无奈之下，“教皇不得已，乃别生一计。谓既不能联合各国，同仇敌愆，若遣传教士充做使臣，与蒙古修好，或亦可止其凶残。况闻和林朝廷，不乏奉教敬主之人，万一劝得大可汗幡然悔改，则可收效无形。烽火之警，从此永息。”<sup>①</sup>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方济各传教士柏郎嘉宾（*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出使蒙古都城和林，劝说蒙古君王归依基督教，与欧洲建立盟邦的关系。由于当时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以及社会及宗教信仰的差异等原因，柏郎嘉宾没有完成教皇所赋予的使命，但他却以此行的经历撰写了一部《蒙古史》，这是一部最早向欧洲介绍蒙古社会的著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后，又有方济各传教士约翰·孟高维诺奉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之命来到中国传教。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孟高维诺抵达汗八里（今北京），获元成宗接见，并获准在京传教。1338年，教皇又派遣方济各传教士马里诺利率领五十名传教士出使元朝。（可参看第一章第一节）

元朝时，教廷与元朝政府之间保持了友好的往来，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比较兴旺的时期。但随着蒙古帝国的衰亡，由方济各传教士在中国开创并曾兴盛一时的天主教传教事业，也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了。

方济各会第二次来华传教的浪潮开始于“地理大发现时代”，包括方济各会在内的天主教各个修会随着殖民者的脚步，开始在世界各地传教，方济各会则把传教的重点放在了他们的前辈曾经开创的中国教区上。此时，耶稣会已经通过澳门开始向中国、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传播福音。1579年（明万历七年），方济各会传教士佩德罗·德·阿尔法罗（*Pedro de Alfaro*）带领7名传教士乘船进入中国海域，于广东珠江口北上，抵达广州城。他们在广东停留了近5个月，最后被广东当局驱逐出境。这次中国之行是方济各会在明末第一次前往中国传教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给后来的传教士留下了先行

<sup>①</sup>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53页。

的经验。此后方济各会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探索，进行了多次尝试，均遭到了失败。直至1626年（明天启六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中国台湾北部的基隆，方济各会传教士们开始在这里建立教堂，发展教徒，为之后进入中国大陆提供了一个中转基地。1633年（明崇祯六年），方济各会传教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被派遣来到中国福建传教。他并不满足在福建已取得的发展，想到中国其他地方去实地考察，以便推进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他先后去了南京、江西省的建昌、南昌，但是并没有达到目的。<sup>①</sup>返回福建后，利安当发现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按中国的礼仪祭拜祖先和孔子。利安当与多明我会的黎玉范（Juan Bautista Morales）认为事件严重，于是开始收集证据，书写报告，上报给罗马教廷。一场旷日持久，在中外交流史上影响重大的“中国礼仪之争”拉开了序幕。方济各会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教皇的支持，全面接手之前由耶稣会控制的陕西教务。

## 第二节 方济各会来陕西的历史背景

天主教方济各会是在“中国礼仪之争”后，取代了耶稣会在陕西教务活动中的统治地位，成为天主教在陕西传播的主导力量。

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是在欧洲殖民者向东方扩张势力，代表不同国家利益的天主教各个修会，积极扩大其在中国传教区影响的背景下发生的。随着新航线的开辟，最早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都是葡萄牙势力的代表，从1582年（明万历十年）利马窦进入中国，垄断中国天主教教务的主要是耶稣会士。代表西班牙利益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也试图进入中国，发展自己的势力。但他们的影响远不及耶稣会，随着更多修会加入来华的传教行列，竞争变的日益激烈、复杂。

“中国礼仪之争”争论的焦点一是对“天主”名称的不同认识，二是对教徒“祭祖尊孔”态度上的分歧。以利马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为了迎合儒家文化，采用“天”、“上帝”、“天主”并用的方式，对教徒“祭祖尊孔”的行为也理解、允许。而以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为代表的反对派则认为这是一种妥协的行为，于是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最终提交罗马教廷解决。在争论的初期耶稣会是占上风的，但后来随着西班牙势力的强大，葡萄牙在华的势力受到挑战，冲突日益升级，加上法国势力的介入，对教廷的影响也不断增大，最后教皇顶不住各方的压力于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解散了耶稣会。

方济各会在“中国礼仪之争”中，并没有始终站在耶稣会的对立面，他们与耶稣会

<sup>①</sup>（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马窦到汤若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对立—靠近—认同的过程。方济各传教士开始严格遵守天主教教义及其教规，强调保持天主教的纯洁性。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在礼仪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传教方法慢慢发生改变。他们初入中国的时候到处鼓吹耶稣基督使徒般的传教方法，身着麻布教袍，赤脚穿街过巷，手持耶稣受难像，高声宣讲教义，让世人放弃对各种邪恶偶像的崇拜，独尊耶稣基督，但是当 they 逐渐开始融入中国社会，接触到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时，他们的态度开始改变，他们开始入乡随俗，开始建立教堂和会院，并以农村为基地开展传教活动。无论是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还是在陕西、山西等内陆地区，方济各会的传教活动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当“中国礼仪之争”最终演变成罗马教廷与中国清王朝之间的一场冲突，天主教在华的传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时任北京教区主教的方济各会会士伊大任（Bernardinus della Chiesa）为了能够保持天主教继续在中国传播，顶住教皇的压力，带领多名方济各会会士领取了“印票”，继续留在中国传教，其中就有在陕西传教的叶宗贤、梅书升等人。失去了教皇支持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势力大为削弱，1696年，罗马教廷设立了陕西宗座代牧区（简称代牧区），将陕西的传教事务交给方济各会会士主持。自此方济各会全面接手陕西天主教传教工作。

### 第三节 陕西代牧区的发展

罗马教廷于1622年设立传信部主管全球传教事务，其目的是从葡萄牙人和各修会手中重新收回处理海外宗教事务的权利，以确保教廷对传教区拥有有效的领导。为此，罗马教廷在新近开发的传教区内推行宗座代牧制度，即在教务发展尚不成熟的地区设立宗座代牧区，由教皇委派代表（宗座代牧）管理其教务。1658年（顺治十五年），传信部在中国设立南京代牧区，由传信部绕过葡萄牙国王而直接指派代牧。此举遭到葡萄牙的抗议，迫于压力，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罗马教廷取消南京代牧区，改建南京、北京主教区，连同原有的澳门主教区，仍由葡萄牙管理，三教区的管辖范围覆盖了除西北和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部分省份，陕西隶属于北京主教区。随着教务的发展，及允许公开传教后对未来传教前景的乐观估计，为了在将来的大发展中占据有利的位置，1696年，传信部又下令将南京、北京、澳门三个主教区的辖区缩小，在三教区之外，在中国境内另设福建、云南、四川、浙江、江西、湖广、山西、陕西、贵州九个宗座代牧区，以分治中国教务。由此，天主教陕西代牧区正式成立。

1696年，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叶宗贤（Basilius Brollo）受任为陕西代牧区第一任主

教。叶宗贤精通汉语，曾编纂过一部 38000 字的拉丁文的中华大辞典。<sup>①</sup>当时，陕西有天主教徒 24000 余人，<sup>②</sup>但是因为以前都是耶稣会的势力范围，耶稣会离陕之前，已经将教产全部处理。因此，方济各会会士初到陕西的时候，在西安没有落脚的地方，只好先在三原建立教堂，作为立脚点。叶宗贤来到陕西的时候，三原县已经有天主教徒 150 余人。三原以北泾阳县的鲁桥镇因为是明末陕西第一个信教者王徽的家乡，天主教在此有较好的基础，拥有更多的教徒，于是在叶宗贤的主持下，将传教总堂设于鲁桥镇。1704 年（康熙四十三年），叶宗贤在鲁桥镇因病去世，安葬于鲁桥镇内。

1705 年（康熙四十四年），陕西代牧区第二任代牧主教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梅书升 (Anto Laghi) 到任。当时由于教牧人员缺乏，山西的教徒要求陕西代牧主教兼管山西的传教业务，于是陕晋两省的教务合二为一。1712 年（康熙五十一年），陕西代牧区与山西代牧区合并为陕晋代牧区，梅书升成为第一任陕晋代牧主教，两个省的传教事业开始由一位主教管理。<sup>③</sup>此时，陕西代牧区除了兼管山西传教活动，同时还兼管西北五省教务及负担湖、广的传教责任，所辖地区大约有 10 省之多。<sup>④</sup>鲁桥镇因地处乡间，交通诸多不便，梅书升派意大利籍传教士马戴第主持西安教务，并在西安土地庙什字购置一块地皮修建教堂，作为陕西教区总堂。此后，在此基础上扩建为有 158 间房的五进院落，这就是后来西安南堂的由来。西安北关二府庄原教会墓地曾发现残破碑石三块，上面清晰的刻有“教友公坟”、“康熙 X 年 X 月”等字样。康熙年间，杨光先攻击天主教，说到天主教在中国“凡三十窟穴”，其中就包括“秦之西安，晋之太原、绛州”。<sup>⑤</sup>反映出这一时期，陕西天主教势力已有一定的发展。

1727 年（雍正五年），梅书升死于西安南堂。<sup>⑥</sup>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方启升 (franc.Saraceni, 1679-1741) 接任陕晋第二任代牧主教。方启升于 1718 年来到陕西，先后修建高陵通远坊教堂和西安南堂。雍正禁教期间，他扮成商人，躲藏山中，秘密在陕西维持教务。梅书升去世后，他以署理主教的名义管理陕晋代牧区教务。1731 年他由四川代牧主教穆天尺（或译穆天池 Mullenez）祝圣为代牧主教。同年，高乐道神父被任命为陕晋代牧区助理主教，1732 年，方启升在高陵通远坊为高乐道祝圣。随后，方启升前去山西，主管山西教务。方启升在雍正初年禁教期间，躲避于渭南贞曲乡张葛沟山

<sup>①</sup> 王哲：《陕西与基督教》，第 100 页。

<sup>②</sup> 西安市档案馆存：《西安天主教会调查报告》。

<sup>③</sup> 陕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

<sup>④</sup> 陕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

<sup>⑤</sup> 陈乐素、陈智超编：《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 224 页。

<sup>⑥</sup> 西安市档案馆存：《西安天主教会调查报告》。

坡的土窖洞中，<sup>①</sup>在这一带继续进行秘密传教活动。1729年，又转入商州沙河子和楼山（今山阳县龙山河）<sup>②</sup>等地传教。为了方便传教，陕西的方济各会士们将传教活动重心转移到广大农村地区，以渭南、商州一带为中心，继续进行秘密传教活动。1740年（乾隆五年），方启升因年老体衰，请罗马教廷另行委派一名主教李爱哲(Cugenio Piloti)为陕晋代牧区第四任主教，并在西安行祝圣礼。1741年，方启升去世，安葬于陕西渭南葛家沟。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陕西的方济各会士为他立碑，碑文上详细介绍了方启升在陕西传教的活动情况：“方启升于康熙五十七年传天主教……历二十余年”。<sup>③</sup>

嘉庆年间，方济各会士在陕的秘密传教活动处境十分艰难。这在《方主教楼山避难歌》中可以体现：“嘉庆皇帝坐燕山，毁谤圣教御史官，号令加追赶。”在清政府实施禁教政策的情况下，陕西的天主教活动并没有因禁教而停止。直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又有不少方济各传教士潜入陕西秘密传教。根据陕西高陵县现存的主教司铎墓碑显示，在这期间有十几位传教士来到陕西进行传教活动。

清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都采取禁教政策，但在陕西的方济各会会士一直进行秘密传教活动。到1804年（嘉庆九年），陕西有天主教徒25000人，比雍正禁教前的人数还多。<sup>④</sup>从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起，直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陕西代牧区所辖地区大约有十省之多，自始至终都有方济各会传教士出任代牧主教主持教务，陕西已成为天主教方济各会在中国传教的大本营。

<sup>①</sup> 张葛沟：在渭南市南40多里地，有土筑祭台，其上十字架还隐约可见。

<sup>②</sup> 楼山：原属商州岭南乡（流岭以南），1949年后，划归山阳县，距县城北40华里，距沙河子翻山90余里。

<sup>③</sup> 章国柱编：《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sup>④</sup> 西安市档案馆存：《西安天主教会调查报告》。

## 第三章 鸦片战争后方济各会在陕西的活动情况（1840—1911年）

### 第一节 通远坊的建立及影响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了一百多年的禁教政策，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活动十分困难，方济各会传教士虽然领取了清朝皇帝颁发的“印票”，继续留在中国传教，保证了陕西传教活动的持续，但外国来的传教士还是难以进入，传教活动也只有民间秘密进行，这种局面到鸦片战争后才有所改变。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的“保教条款”使得天主教之前在内地传教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的行为。此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陕西，1840年（道光二十年）以后，陕西的天主教势力急剧发展，通远坊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

通远坊是方济各会在陕西的传教基地，是开展天主教传播活动的重要场所，由方济各会冯尚仁（Alfonso Donato）主教所建。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由于教务发展需要，山西代牧区由陕晋代牧区独立出来，分化为陕西代牧区和山西代牧区。同年4月2日，罗马教廷发来委任状任命冯尚仁为陕西代牧区主教，同时兼管甘肃、青海的传教工作。当时陕西的教徒已经达到15000人左右，山西的教徒则有8000人左右。

冯尚仁到陕西后，对总堂的地址选择犹豫不定，他既担心地址如果选择在通都大邑会比较容易引人注目，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又考虑到如果距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太远，将会影响到天主教的传播工作，正当此时，有几位高陵县郭路家村的教徒，极力劝说冯尚仁主教将总堂建于郭路家村附近。该地区为一大片荒芜之地，多义坟荒冢，无人耕种，既不通大路也与通都大邑距离不太远，易避人耳目，便于进行宗教活动。另外，关于总堂选址还有一种说法，据传郭路家的教友精于武艺的人很多，在宗教及其他活动方面如果发生问题，可以从中调解保护。以至后来教会为了感谢郭路家教友的保教之功，规定每星期派神甫到郭路家举行弥撒圣祭，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由于此地地处高陵县郭路家村，距离西安还有100多里，不会引起省城官员的注意。同时交通便利，有利于传教活动的开展，于是冯尚仁决定将传教总堂建立在高陵通远坊，并且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所神学院，以培养神职人员。定名“通远”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往天主教所说的天堂，一是指通往远方的罗马教廷。之后的主教继续以通远坊为根据地大力发展教务，1838—1861年间，在陕西进行传教的外国传教士有近10人，足迹遍及陕西全境。通远坊成为陕西的传教基地。据说当时从国外寄给“通远坊”的信件，只需写上“中国通远坊”即可寄到，通远坊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可见一斑。至1930年，方济各会将传教



总堂迁至西安南堂，但其根基仍在通远坊。陈光世先生在他所著的《西京之现状》一书中提到：“天主教总堂在西安土地庙街……天主教之根本势力，则在高陵之通远坊，其地几与租界无异。”<sup>①</sup>通远坊自建立天主教教区总堂后，发展很快，不久就成为一座人烟稠密的新城市，俨然一处外国租界。<sup>②</sup>

冯尚仁神甫积极想把通远坊建成传教中心，但 1848 年 3 月 20 日因病去世。他的墓和碑现在还存放在通远坊教堂内。碑文记载：“（冯）道光乙巳（1845 年）由晋来陕，分设学堂，意极草创，尚未大备，越戊申（1848 年）积劳而薨。”继冯尚仁成为陕西代牧区主教的是高一志（Ephesus Chiais），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于 1834 年（道光十四年）来华。当时中国的教务是由葡萄牙政府把持，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在澳门排挤其他国家的传教士，高一志不是葡萄牙人，又没有得到葡萄牙政府的批准，到澳门以后，就被扣留软禁。高一志一心到中国内地传教，想尽办法和中国两位经商的传教士密谋，暗中逃走，潜入中国内地。他先在山西传教，1835 年来到陕西。冯尚仁指定高一志为接任主教，1849 年，高一志正式成为陕西代牧区主教。他在任期内，大力扩建通远坊，加强主教府和神学院的建设，并主持修建了通远坊大教堂，这座教堂高 5 丈、宽 4 丈、长 15 丈，气势恢弘。通远坊在高一志的主持下成为天主教在陕西甚至西北地区的传教中心。据通远坊现存的司铎墓碑可考的传教士有 12 人，传教地点有三原、周至、户县、岐山、渭南、临潼等地区。外省的则有山西、甘肃甚至到达了新疆伊犁等地区，<sup>③</sup>同时还有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士参与传教活动。由此可见，方济各会以通远坊为根据地大力发展教务。在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及“保教条款”的签订，使天主教传教的外部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传教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陕西，陕西的天主教势力进一步发展。

## 第二节 回民起义中方济各会活动情况

1862 年（同治元年），陕西爆发了回民起义。陕西地区回汉杂居，根据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sup>④</sup>记载：“原在陕西省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和乾、三原二十多县住有回民七八十万到一百万，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回汉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械斗时有发生。1862 年，渭南回民越界砍伐华州汉民的竹木，被打死两人，引发了回民的众怒，而华州、渭南两县的官员明显偏

<sup>①</sup> 陈光世：《西京之现状》，西京筹备委员会出版社，1933 年版。

<sup>②</sup>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

<sup>③</sup> 王霄：《基督教与陕西》，第 133 页。

<sup>④</sup> 杨虎城、邵力子编：《续修陕西通志稿》，1934 年，铅印本。

袒汉民、歧视回民的做法更使得矛盾激化，由此引发了暴动，很快又演变成大规模的起义。1862年5月，渭南、华州、大荔等地的回民首先发动了起义，很快就席卷了整个关中地区。9月时，回民起义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几乎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清政府多次派兵镇压，但收效甚微。这次回民起义带有报复的意味，因而不可避免的出现民族间仇杀的情况。尤其是战争初期，关中地区成为血腥杀戮的场地，灾民四处逃亡，生灵涂炭，“渭河南北各州县汉回互相残杀，”<sup>①</sup>结果使得陕西人口锐减，关中人口损失了45.8%，陕西全省人口减少466万人。<sup>②</sup>

但在这次起义中，回民义军却与陕西天主教教会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据1866年（同治五年）陕西巡抚刘蓉向清政府报告起义的情况时说：“同治元年，陕省回变蜂生，渭北高陵首先煽乱，凡属汉民村庄无不焚毁，汉人男妇无不伤残，至今蔓草荒烟，几无寸椽片瓦。独该教人（指天主教，笔者注）所居高陵通远坊五村毫无凌犯，屋宇庐舍，岿然独存，谓系同教之人不加害。由是汉民之畏死避祸者，往往投入彼教，冀祸幸存。是其同类相护，亦既显有明征矣。”<sup>③</sup>可见，在这次回民起义中，关中的天主教得以保存。关于回民起义时陕西天主教的情况有一段记载：“正当高一志对传教事业发展情形，欣欣自慰之时，便在扩充了的主教府的基础上准备修建一座大教堂。不幸在公元1862年，陕西的回民突然叛变，时间长达两年之久，整个陕西省人民，遭受其焚烧抢劫和铁蹄之蹂躏。在此旷古未闻的恐怖与浩劫之中，本省地区，不少通都大邑，荡然无存，二百多城市和要塞不但被摧毁殆尽，而且居民全被屠杀，死难之人数总计达到二百多万之多，真是空前未有之奇灾也！在此浩劫之中，教会传教事业之所以未被摧毁殆尽，实由于天主之特别默佑，至今本省人一提起回民叛乱的故事，犹谈虎色变。”<sup>④</sup>

《户县乡土志》<sup>⑤</sup>载：“天主教则自咸丰中天津议和，法传教士驻高陵神甫来户传教，而从者尚属寥寥。自回匪猖獗，不杀从教之人，由是从者日众。”在民国时期编纂的《时政调查报告书》中也有记载：“同治元年回变将作，法教士高一志时在县西之通远坊传教，与叛回为首者相约，凡县民在教者特异其标识，彼此无相侵害，后果坚明如约。”回民起义期间，陕西代牧区主教是高一志，当回民军队进入通远坊时，高一志和回兵首领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回民义军不杀在教（天主教，笔者注）之人，天主教徒受到保护，没有遭到严重损失。关于方济各会在这次回民起义中所受的影响，马雷氏神甫有很详细

<sup>①</sup> 《清穆宗实录》，卷30，中华书局，1985年版。

<sup>②</sup>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1页。

<sup>③</sup> 王学泰编：《清末教案》（第二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158页。

<sup>④</sup>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纂：《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

<sup>⑤</sup> 中国地方志丛书编委会编：《户县乡土志·宗教》，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

的记载：“在大乱开始之际，教友也受害不浅，但高主教才干很大，应酬得当，与匪徒往来周旋甚善，因而匪徒不但不加害教民，反而特别保护并帮助教民。以后匪徒与教民竟好到这般程度，甚至有时勉强教民接受抢来的赃物。教民不愿分受不义之物，后经高主教明喻教民接受以后待机会退还原主，遂有人接受匪徒所赠赃物。”<sup>①</sup>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些普通民众，为了保护自身，纷纷入教接受洗礼。这些为避难受洗的教徒，害怕回兵二次起义，在回民起义平息以后，也不敢擅自退教。由于高一志神父与回民义军的良好关系，他常常被邀请调解义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将领们甚至一致同意高一志做他们的领袖。高一志主教对前来邀请他做首领的义军代表，态度和蔼，殷勤接待，但对具体请求却笑而不答。为了不发生误会，结怨回兵，高一志主教详细解释了不能接受请求的理由，又以厚礼回赠他们，义军代表走后，高一志主教笑而顾左右说：“戴着主教高冠，而充当穆罕默德的首领倒真荣耀啊！”<sup>②</sup>以后，高一志主教与回民首领往来如昔，仍不失为朋友。由此可见，在这次回民起义中，天主教方济各会运用良好的外交手段，并利用回民义军希望联合天主教壮大自己声势的机会，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入教，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清政府在镇压了回民起义以后，慑于“保教条款”，对天主教无可奈何，陕西天主教的势力也因此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

回民起义后，陕西的天主教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1867年（同治六年）陕西共有天主教徒2.3万人，到了1920年（民国9年）陕西的天主教徒已经达到5.7万人，有天主教堂300余座，分设149处，其中外国神甫28人，外国修女38人，中国神甫38人。<sup>③</sup>人数比同治年间增长了一倍还多，40年间受洗的信徒是前300年的总和。而且“天主教亦遍行乎之辅及山南山北之区。”<sup>④</sup>因为在这次回民起义中，教会的行为给当地的老百姓造成了一个印象，即上帝可以庇护他的子民，使其免遭厄运。这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可以这样说，回民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对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第三节 1878年陕西旱灾中方济各会活动情况

1878年（光绪四年），陕西发生大旱，灾情严重，饿殍遍野，大量灾民流离失所。史料记载：“光绪三年夏六月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三尺，田苗尽没，是秋无禾。自七月

<sup>①</sup>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纂：《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

<sup>②</sup>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纂：《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

<sup>③</sup>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1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sup>④</sup> 杨虎城、邵力子编：《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

不雨，至于明年六月，冬无宿麦，夏赤地百里，斗麦两千有奇，庾毙男妇三千余人。”<sup>①</sup>在这样的灾情面前，陕西天主教方济各会积极开展救灾活动。陕西代牧区主教高一志和助理主教林奇爱，指挥教徒将流落四方的饥饿灾民召集起来，组织他们修建通远坊大城墙，赈灾修寨，使得这些流离失所的灾民有饭吃，有事做，一举两得。还以教会的名义出粮赈济，规定饥民领取粮食的时候必须立誓入教并保证永不退教，许多人迫于生计无奈入教，教徒人数急剧增加。<sup>②</sup>

1879年（光绪五年）教民将此事刻于石碑，以宣扬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高一志、林奇爱赈灾济贫的功德。此碑立于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今佚。根据高陵县文化馆藏碑文录之如下：

恭送传教部总理陕甘全省监管新疆等处正（副）主教高（林）大人德行碑

尝曰：上天有好生之德，君子有爱人之心，□教非有仁爱之德存于心焉，有赈济之恩及于久也耶。考其外来中，传教五十余载，寿高七旬余岁，自奉虽甚淡薄，周恤独不吝惜。其持身也，小节不忽，其制行也，大体克敬。谦光时见于接人，宽柔更征于垂教。世乱□生救人，年凶则疏财济众。乱在壬戌，、救民命不下□千，荒逢戊寅，复活饥殍者实有数百□。其他代理粮台，□恶救善，□散籽种。为□助□以及修□□□合药济人，养老□孤，舍放葬器，并顾困圉被□者，无非本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道也。光复信友，更重于外□□□。日日散饼，而且□礼二日散钱□。至隆冬复散棉衣御寒。推其爱人之心，视天下犹一家，视教民如兄弟。思人之饥由己之饥也，思人之溺由己之溺也。何慈祥□□□是之深也。宜乎邻里乡党，聆教渝者，欣欣向化。州府县城，望风采者，殷殷欲归。人□□□欲报德而无方，欲称颂而□能，公议立碑，以表其德。

这篇碑文详细的记述了在这次旱灾中通远坊的主教和副主教的赈灾行为，可以看出在大灾之际，方济各会传教士加紧传教活动，大力发展教徒。1845年冯尚仁任主教时，陕西约有教徒13000人，到了1878年就达到了25000人，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sup>③</sup>1884年，林奇爱接任高一志，成为陕西代牧区主教。在任期内扩建了通远坊大教堂，新建通远坊主教府三层大楼，修筑通远坊北城，不断扩大通远坊的规模。1886年，建造修女楼，方便发展妇女入教，由欧洲方济各圣母传教会的修女管理。兴办慈善事业一保赤会，包括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和医院等机构。1892年，林奇爱在西安土地庙原西安南堂旧址上，重新修建了一座大教堂，进一步将势力扩展至省城西安。

<sup>①</sup> 成维雍编：《高陵县续志》，成文出版社，2007年版。

<sup>②</sup> 高陵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高陵县志》，第675页。

<sup>③</sup> 西安市档案馆存：《西安天主教会调查报告》。

1845年—1900年，是陕西天主教势力迅速增长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方济各会抓住一切时机，扩建教堂，发展教徒。1862年的回民起义、1878年的陕西大旱灾等等，都为会陕西天主教发展提供了机遇。

#### 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对陕西方济各会教务的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各国加强了在华势力范围的划分和对中国的控制，而清政府在这样的情势下，不断的妥协退让，主权不断丧失。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摧残，每个阶层都受到冲击，对西方列强义愤填膺。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不断高涨，反抗斗争也日趋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终于爆发。

义和团运动是几十年来连绵不断的民间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扩大。据统计，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外国传教士在华人数约有3000人，教区40余个，教徒达到了85万人。在陕西地区共有教堂和各类传教点500多处，教徒达到3万人。<sup>①</sup>当时与下层民众接触最多的洋人就是传教士，而这时，传教士就被当成外国侵略的代表，加上一些传教士专横跋扈、作恶多端，引起了公愤，因而这场运动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洋教”。根据不完全统计，在1900—1901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3/4的教堂被捣毁，天主教方面有5名主教，教士48名，修女9名、修士3名、中国教徒近3万名遇害。<sup>②</sup>

与全国范围对比，陕西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当时的陕西巡抚端方力排众议，力主保教，因此陕西教会幸免于难，方济各会主持的大部分的陕西教区也因此保存了实力。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9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西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陕西，命陕西巡抚出兵镇压陕西关中地区的义和团，并下谕保教：“现在陕西大兵云集，高陵、汉中及各处教堂，所有教士教民人等，该地方官务须格外认真保护，相安无事。倘有不法兵丁，在于教堂处所，滋生事端，定将该兵丁即行正法，并将该管带官及地方文武，一体从严惩办，决不宽贷。”<sup>③</sup>在这样的背景下，陕西关中地区的天主教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在陕北靖边和陕南宁强等地都发生了多起教案。影响比较大的有燕子砭教案、三边教案、平利县洛河教案。

燕子砭当时属于汉中府的宁羌州，清光绪年间天主教传入宁羌，先后有数名外籍神

<sup>①</sup> 夏春涛：《教案史话》，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sup>②</sup> 王哲：《基督教与陕西》，第171页。

<sup>③</sup> 《清德宗实录》，卷471，中华书局，1985年版。

父到燕子砭传教并建立了教堂，主持燕子砭教堂的神父为意大利籍传教士郭西德（Albericus Crescitelli），因其在当地依仗权势为非作歹而发生了民教冲突，史称燕子砭教案。《宁羌州乡土志》对燕子砭教案的发生有明确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州西大旱，法国天主教士郭西德以赈济为名，诱民入教洎来者日众，供億不支，乃纷纷苛派良民，主客交江，遂起焚杀之祸事。”<sup>①</sup>另外，在汉中天主堂发现为郭西德所立石碑，碑文如下：“郭君西德，泰西大意国人，生于同治二年五月二十日，光绪十三年升司铎职，十四年奉遣来华传教，后至宁羌州燕子砭居焉。二十六年庚子，拳匪祸作乱，民闻风滋事，君遂于六月二十五日被戕，得年三十八岁。”<sup>②</sup>从这段碑文中可以看出燕子砭教案发生的过程和一个重要特点即燕子砭教案与义和团运动有关。据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中《宁强教案调查》一文所述，燕子砭教案的首要领导人为李云栋，其兄李朝栋当时在汉中府教书，李云栋在得到义和团运动的消息后与李朝栋联络当地潘长富、潘长贵等人，发动数百名群众于1900年7月20日，持刀矛和各式农具向位于青岗坪的燕子砭教堂发起进攻，郭西德被民众围困住，未能出逃，于次日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杨兴隆、李大银、周雅各等中国籍教民。反映出燕子砭教案发生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背景中。最后燕子砭教案以清政府对洋人的妥协和对民众的残酷镇压而告终。

三边教案，三边指位于陕北的靖边、定边和定边县所属的安边堡一带。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就有比利时传教士叶茂枝由绥远至靖边县属的宁条梁镇传教，建立了南沙口教堂。1882年（光绪八年）又有法国教士在靖边县所属的宁条梁蒙人居住地红柳滩小桥畔一带建立教堂传教，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三边天主教势力已有很大发展。据现修《靖边县志》记载，天主教会在靖边雇佣大批长短工，兼营农牧，凡种不完的土地出租，每年即可掠夺10万多银圆。天主教会规定：教民见教士必须行长跪、磕头、揖拜大礼。星期天全体教民必须停工、罢市做弥撒，不准听书、看戏，教会可随意强制民家良女充作修母。“二洋人”（教堂中掌柜、会长）为洋教士心腹，有审理、诉讼、搜查教民居室的权力。<sup>③</sup>传教士在占用大量土地后，对当地农民进行地租剥削。教会和农民在经济利益上发生严重冲突，与此同时，教会还干涉地方行政，偏袒教民。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三边农民的反教心理被点燃，引发出一场较大规模

<sup>①</sup> 陈芑芬编：《宁羌州乡土志》（铅印本），燕京大学图书馆，1937年版，第51页。

<sup>②</sup>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17辑），第47页。

<sup>③</sup> 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的反洋教斗争。《秦中官报秦事汇编》<sup>①</sup>甲辰三月条记：“庚子夏间，津沽变起，三边蒙部亦因与教堂不和，而起争端。”1900年，义和团在靖边开始活动，反洋教会斗争不断发生。同年7月15日，义和团团民红灯照姑娘及乌审、鄂托克旗蒙兵共数百人，先捣毁了南沙口教堂，继而围攻小桥畔教堂，此次围攻长达48天之久，因教堂内藏有枪支弹药，力量对比悬殊未能攻克。战斗过程中三边群众伤亡达百余人，击毙外籍教士1人，教民10人。随着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由“抚”到“剿”，三边围攻小桥畔教堂的群众最终在清军镇压下，相继散去。事后，三边天主教堂以打死传教士一名为由，与清政府交涉。据陕西省参事室编的《三边教案记略》记述教案发生后，中方赔偿14.35万两白银，分别由乌审旗分担4.55万两，鄂托克旗、札萨克旗分担9.8万两，后乌审旗因无钱可筹将大淖碱池作为抵押，鄂托克、札萨克两旗付出3.4万两，后欠6.4万两无力支付，被迫将边外原归汉民耕种的土地，作为赔偿抵押，面积约25920平方公里。<sup>②</sup>

平利县洛河教案，平利县位于兴安（今安康地区东部），处于川、陕、鄂三省交通要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陕西境内外国教会势力迅速发展，1890年天主教汉中总堂在兴安府的石泉、安康、平利等县又设分堂。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平利县洛河爆发了一起反洋教事件，并提出了“兴汉灭洋”的口号，声称要攻教堂，杀教民，此即洛河教案。这是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陕西境内又一起规模较大的教案。据政协安康县委员会编的《平利洛河教案纪实》所载，这次教案的发生最初由教徒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当时洛河地区团保袁瑞林、刘子模因肆意征收烟地税金，引起民愤，被当地民绅詹朝珠等控官责革。袁、刘两人即投奔天主教堂，为报复詹朝珠，袁瑞林诬告詹等人勾结四川哥老会的何彩凤在洛河一带毁谤教会。安康教堂教士当即写信给平利县知县王宗濂，要求查办此事，王宗濂派人将何彩凤锁押，哥老会首领王乱刀子听说后，立即集合众人将何彩凤夺回，并至袁瑞林家将其房屋烧毁，击毙袁瑞林父子及其余教民4人。同时，将安康教堂派往洛河调查事件的教民叶大伏和一名清兵砍死。事发后，陕西巡抚急令缉拿王乱刀子等人，安康平利县很快将王等6人缉拿，何彩凤于是集合众人驻于洛河旁的太白庙，竖起“兴汉灭洋”的旗帜，前来加入者达千余人。最初的冲突，发展成为一场规模较大的反清反洋运动。后来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平利洛河起义失败。经过与教堂的协商，议定结果此案义军杀死教民7人，给安康天主教会赔银8000两，在平

<sup>①</sup> 《秦中官报》，陕西早期官办报刊，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夏创刊。1906年前由陕西课史馆选印，后改由西安法政学堂出版。

<sup>②</sup>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纂：《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

利县洛河镇为教会修建教堂一座。

这三宗教案发生在由米兰外方传教会控制的陕南和圣母圣心会控制的陕、蒙交界地区，相比较而言，方济各会领导下的陕西其他地区的天主教教务活动却没有遭受更严重损失。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极力满足列强的要求，许多在此次运动中被控有焚毁教堂、伤害传教士等仇教行为的地方军政官员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清政府中仇视外国势力者被剪除，为20世纪后教会在华活动清除了阻力。同时，清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保教措施，这种特别的保护为天主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权的保障，使得原本就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各种特权的基督教，获得了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陕西天主教传教工作迅速恢复并继续扩大传教规模。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向列强支付白银4.5亿两巨额的赔款，从1902年起到1940年付清，连本带利共计9.8亿两。在大量的赔款外，还有由地方官和教士议定、由地方自筹款项，赔偿教堂、教民“损失”的“地方赔款”，赔款总计约2000万两。在地方赔款以外，还有一种没有名目的赔款，即教堂以赔偿教堂、教民损失为由向当地百姓直接收取的款项。这些名目繁多且数额巨大的赔款，为教会的重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 第四章 民国时期方济各会在陕西教务的发展（1911—1949年）

### 第一节 陕西各个教区的发展及主教更替情况

1696年，陕西正式成为天主教代牧区。由于实行禁教政策，教牧人员缺乏，到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陕西、山西代牧区合并为陕晋代牧区。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天主教凭借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条款”，公开买地置业，发展教徒。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山西代牧区分化独立，陕晋代牧区恢复为陕西代牧区。1869年（同治八年）12月8日，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开幕，会上议定陕西代牧区教务继续由方济各修会代为管理。<sup>①</sup>陕西天主教工作在方济各会的领导下快速发展，为了更加有效的实施教务管理，1887年（光绪十三年），陕西代牧区以秦岭为界分为陕西南部代牧区和陕西北部代牧区，陕西南部代牧区包括汉中、兴安、商州南部，由米兰外方传教会（Milan）管理教务工作，后由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会接管其工作。陕西北部代牧区包括关中和陕北地区。随着传教活动的不断发展，1911年（宣统三年），陕西北部代牧区分化为陕西中部代牧区和陕西北部代牧区。陕西中部代牧区下辖西安、同州、凤翔、乾州、商州北部地区。陕西北部代牧区下辖榆林、绥德、鄜州等地区。1924年，经罗马教廷批准，陕西中部代牧区更名为西安代牧区，陕西南部代牧区更名为汉中代牧区，陕西北部代牧区更名为延安代牧区。随着传教工作的开展，教徒人数的增多，一些发展成熟的区域再次从母教区中分离出来，建立监牧区或自立区<sup>②</sup>：1928年，汉中代牧区分出兴安监牧区（后改为安康监牧区）；1931年，西安代牧区分出三原监牧区与同州自立区；1932年西安代牧区中再分离出整屋监牧区与凤翔监牧区，由国籍方济各会管理。<sup>③</sup>至此，陕西八大教区格局初步形成，方济各会占据着除汉中代牧区外的延安、西安、整屋、凤翔、同州、安康和三原七大教区的领导权。

#### 一、汉中教区

1887年（光绪十三年），罗马教廷设立了以汉中为中心的陕西南部代牧区，由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和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会管理，1924年，更名为汉中代牧区，经过发展扩大1928年分出兴安监牧区，1946年升级为汉中主教区。

在陕西天主教传播的历史上汉中地区是最早发展的地区之一。1635年（明崇祯八

<sup>①</sup>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dtian Missions in China*. pp.241.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转引自张晓虹：《陕西天主教区的初步研究》，《九州学林》，2005年·夏季（三卷二期）。

<sup>②</sup> 自立传教区简称自立区，宗座监牧区简称监牧区。它们都是代牧区的准备阶段，一般由自立区发展为监牧区，进一步发展为代牧区。

<sup>③</sup> 张晓虹：《陕西天主教区的初步研究》。

年)耶酥会法国传教士方德望(Stephanus Faber)在汉中建立了教堂,经过几年的发展,入教人数达到3000余人。20年后,传教达到15个县城,受洗的人数达到了24000余人。根据《圣教信证》注:“方神甫生平有圣德,多行灵迹。故去世后(顺治十四年),未奉教者,亦立碑祀之,其庙俗称方爷庙。”<sup>①</sup>当时教务非常兴隆,湖北北境的天主教会就是由汉传入的。

汉中代牧区成立后,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会的意大利人安相廷(Gregorius Antonucci)为首任主教,他在古路坝等地修建教堂,成立拉丁学校、孤儿院、残老院。他的继任者是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会的拔士林(Joseph Passerini),他曾修建古路坝大教堂,并于1910年开始在汉中市修建教堂和主教府,逐渐将教会的势力由农村转向城市。他担任主教期间,清政府授予他“八台总镇”头衔,出入官府,一品顶戴,包揽诉讼,干涉民事。根据民国元年统计,在拔士林担任主教期间,汉中教区共有教徒达到14625人,堂口80余处。

拔士林之后的主教是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会的康道华(Ant.maria Capettini),他曾成立汉中教区国籍修会“善导修女会”,并于1922年开设经言要理班。后来因为他执行罗马教廷命令不力,于1928年被撤职。

继康道华之后的主教是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的巴明善(Lorenzo Balconi),他上任后首先合并了各堂口的3000多亩土地统一管理,建立各会堂会长制度,并在各堂口组织“公教青年进行会”,忠实执行罗马教廷的政策,后于1934年被提升为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会长。

1934年,巴明善调职后,于次年由河南卫辉教区调来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神甫祁济众(Marius Civelli)为主教,到任后他首先发展教育事业,创办了中学1所,小学30所,经言教理班50所,后被调离,继任者是从河南南阳教区调来的孟守道。

孟守道(Joseph Maggi),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会士,意大利人,到汉中后坚持了前任康道华的做法,继续增加了中学的高中班,扩大了小学的班级,成立了一所设备完善的医院,开展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后被驱逐出境。截止1949年,汉中教区共有天主教徒约20000余人,教堂150多座。

## 二、延安教区

陕北地区天主教传入的时间比关中地区稍晚。清朝初年天主教曾传入延安一带,有

<sup>①</sup> 韩霖、张庚:《圣教信证》,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0年版。

记载说 1719 年（康熙五十八年）“方济各会方神甫去延安开教，付洗二百人。”<sup>①</sup> 1850 年（道光三十年），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龚山林曾到绥德、榆林等地传教。<sup>②</sup> 由于负责陕西传教的方济各会士传教活动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而在陕北地区只有零星的传教活动，因此陕北天主教发达的地区多是在周边的内蒙古和山西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1911 年（宣统三年），陕西北部代牧区分化为陕西中部代牧区和陕西北部代牧区。1924 年陕西北部代牧区更名为延安代牧区，由西班牙籍方济各会会士管理。第一任主教是西班牙人易兴华（Cae.Ibanezy Aparicio），他任延安代牧区主教长达 30 多年，建立教堂于延安附近的桥儿沟，并办有小修院一所，培养了国籍神甫 30 多名。创立了修院、小学、孤儿院、经言学校，建立了教区总堂，使得教区建设不断完善。同时传教工作也很有成效，除府谷、清涧、宜川、吴旗外，天主教已经传播到了陕北的大部分地区。最为兴盛的时期有神甫 30 余人，大小教堂 50 余处，教徒近万人。<sup>③</sup> 1946 年，延安代牧区升级为主教区。

### 三、西安教区

1911 年，陕西北部代牧区分为陕西中部和陕西北部两个代牧区，法籍方济各会士穆理斯（Gabriel Maurice）任陕西中部代牧区主教。新教区的设立一方面是教务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要解决原陕西北部代牧区内部矛盾。当时在陕西各地除了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外，还有英、法、德及西班牙等国的方济各会士。各国教士之间因为各国的利益关系存在着矛盾，彼此相互排挤。之前陕北代牧区的主教分别是意大利人何理熙（Odorico Giuseppe Rizzi）和德国人胡定邦（Atanasio Goethe）。穆理斯任陕西中部主教期间，经常干涉地方政务，影响极坏，好大喜功，教务活动表面风光，实际是虚张声势。这种做法引起其他传教士的不满。1916 年穆理斯被迫辞职，临走时还叫嚣：“我法国河山不倒，我还要再返长安。”<sup>④</sup>

罗马教廷派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希贤（Eugenio Massi）来到陕西关中，接任陕西中部主教，管理关中教务。希贤在陕期间，组织武装自保，与当时陕西军阀交好，在当时军阀混战的状况下，通远坊相对安全，成为一处避难所。

1924 年，罗马教廷把中部代牧区更名为西安代牧区。由于希贤还监管汉口的教务，为了使西安代牧区有专人负责，罗马教廷委任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戴夏德（Florentius

<sup>①</sup> 张泽：《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光启出版社，1981 年版。

<sup>②</sup> 《龚振铎德教碑》，载自董国柱编：《高陵碑石》。

<sup>③</sup> 李大海、吴宏歧：《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过程时空特征分析》，载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 01 期。

<sup>④</sup> 陕西省政协存：《陕西地区天主教历史汇编》。

Tessiatore)为西安代牧区主教。戴夏德 1916 年就随希贤入陕，任通远坊天主教神哲学院院长，一直致力于教务的拓展，在任期内把通远坊神学院扩建为大、小修院两个部分。戴夏德任主教期间，西安代牧区有教徒 42000 人，中外神职人员 55 人。1930 年，戴夏德将总堂由通远坊迁至西安土地庙十字天主堂即南堂，西安随后成为陕西关中地区的教务中心。

1932 年，戴夏德因病去世，由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万九楼(Julius Vanni)接任西安代牧区主教。三原、大荔、周至、凤翔先后从西安代牧区独立，西安代牧区负责管辖西安、长安、临潼、蓝田、商县、丹凤、洛南等地的教务。1946 年，西安代牧区升格为总主教区。截止 1949 年共发展天主教徒约 20000 人左右。<sup>①</sup>

#### 四、三原教区

1931 年，三原监牧区由西安代牧区独立出来。同年 6 月 4 日，罗马教廷传信部宣布三原监牧区成立，并正式委任通远坊神学院院长方济各会士班锡宜(Fulgentius Passerini)为三原监牧区首任监牧主教。7 月 6 日班锡宜在西安土地庙什字天主教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7 月 24 日在通远坊举行庆祝典礼。<sup>②</sup>

在关中教区中，三原监牧区出现最早，范围包括渭北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礼泉、乾县、永寿、淳化、旬邑、彬县等 14 个县，有教徒 10000 余人。开始三原教区还包括兴平和武功两县，后来因为产生了盩厔教区，罗马教廷随之将这两个县划归了盩厔教区。三原教区是陕西天主教的发源地，明末天主教再次入华传教时，陕西天主教第一人王徵最先把天主教传播到陕西，之后耶稣会会士就在三原、高陵一带传教，发展了大批教徒，为天主教的传播打下了基础。陕西地区第一任代牧主教方济各会会士叶宗贤刚到陕西传教时，也是以三原、泾阳作为落脚点。1844 年，陕晋教务分开后，陕西第一任代牧主教冯尚仁更是把通远坊发展成为陕西的传教基地。直到 1930 年教区总堂由通远坊迁到西安，三原教区依旧是陕西天主教的根基所在。

清光绪年间，大量山东移民来到三原地区，其中有大量的天主教徒，使得三原的天主教势力有了大的发展，在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很早就建有教堂，还有教会办的学校、医院等等。1944 年，三原监牧区升格为代牧区，1946 年，三原代牧区升级为主教区。<sup>③</sup>到 1949 年，三原县境内共有天主教堂 15 座，教徒 3000 余人。<sup>④</sup>

<sup>①</sup> 西安市档案馆存：《西安天主教会调查报告》。

<sup>②</sup>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陕西省民族志·天主教部分资料》。

<sup>③</sup> 陕西省政协存：《陕西地区天主教历史汇编》。

<sup>④</sup> 王雪：《基督教与陕西》，第 224 页。

## 五、整屋教区

整屋地区也是陕西天主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在这个地区的影响日益广泛,到了1911年,全县有天主教堂23处,信教人数达到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sup>①</sup>

1931年6月,方济各会高启正神甫向与主教戴夏德提出整屋条件很好,天主教在此地的传播素来就有传统,有独立发展的实力,可以将整屋划分为华籍教区,以便吸引更多的民众入教。此举得到戴夏德的支持,随即上书给罗马驻中国代表刚恒毅总主教,1932年7月,罗马教廷同意将整屋、户县、兴平、武功、扶风、眉县共6县划为华籍教区,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理,定名为“整屋监牧区”,共有神甫20位,教徒24000余人,指定本区华裔神甫张指南为首任监牧主教。<sup>②</sup>

整屋教区是陕西第一个国籍教区,神职人员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区内教堂林立,教产丰富,教徒人数也最多。解放后,周至教区由监牧区升格为正式主教区,首任正式主教为李伯渔。整屋教区是陕西教务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 六、凤翔教区

1932年,凤翔监牧区由西安代牧区分化出来,它原是陕西最早拟定的国籍教区,不过因为教会内部,争夺教产及归属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因此,凤翔监牧区虽然萌芽很早,但是划分教区却在其他教区之后。由于整屋监牧区的成立,扶风、眉县划归整屋监牧区,凤翔教区所属六县仅有本籍神职人员5位,这就给凤翔教区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济各会总会长舒乃柏(德籍神甫)呈请罗马教廷将凤翔教区交由方济各会管理。

1932年底,罗马教廷批准并委任山西方济各会神甫王道南为凤翔教区首任监牧主教。翌年,委派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范济各为凤翔教区方济各会会长,统管全区教务大权,从此,凤翔监牧区虽名为国籍教区,实际上则为方济各会掌握。

凤翔监牧区由方济各会管理后,教徒达到4300余人,大部分都集中在岐山、凤翔、宝鸡三县,1933年由西安代牧区拨款在凤翔城内西大街购置地产二十余亩,修建了几十间房舍,建立起了教区总堂。1936年,又在城南购地十余亩,创立了一座小修院,不久这座小修院就成为了培养方济各会会士的会院。1944年,凤翔教区由监牧区升格

<sup>①</sup> 《周至县志·民族宗教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页。

<sup>②</sup> 陕西省政协存:《陕西地区天主教历史汇编》。

为代牧区，华籍神甫王道南任代牧主教。<sup>①</sup>1946年，升格为主教区。凤翔教区成立后共发展教徒3000余人，较之过去百年，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到1949年，凤翔主教区已有教徒10000余人。<sup>②</sup>

### 七、同州教区（大荔教区）

同州教区也称大荔教区，1932年由西安代牧区划分而来，称同州自立区，1935年升级为监牧区。首任主教为方济各会意大利籍神父穆继文(Petrus Moretti)，监牧区刚成立时，神职人员有方济各会意大利籍传教士6位，国籍神甫2位和2位国籍修道生韩希平、张文彬。因为神职人员缺少，特别由北京、衡阳两教区请来2位国籍神甫王化民和郭伯宏协助教务。

同州监牧区总堂设于大荔县城内东大街，教徒有4000余人，分布在大荔、蒲城、白水、韩城、华阴、潼关、渭南等地区，以渭南的河南、河北一带教徒最为集中。自成立监牧区以来，办有“三德小学”一所、小修院、医院各一所。共培养出国籍神甫8名。渭南地区是同州监牧区开教最早的地区，从1821年（清道光元年）起，先后有8位意大利籍传教士到此地主持教务活动，到了1949年，教徒共有2597人，是教区内教务最为兴盛的地区。

同州监牧区成立后，教务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与关中其他教区比较，教务发展还是相对较慢的。

### 八、安康教区

安康教区原名兴安，属于汉中教区的一个堂口。1928年，由汉中代牧区划分出来成为安康监牧区，包括石泉县、洵阳县、汉阴县、平利县、紫阳县等。安康是监牧区，首任主教是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苏辑五(Joannes M.Soggiu)。1929年，苏辑五在外出视察教务时被害。1931年，罗马教廷委任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巴南初(Bernardus Baracciu)为第二任监牧主教。巴南初曾办有小修院一所，以培养国籍神甫。1940年中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轰炸安康，巴南初被炸死。其继任者为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方万道(Aemilius Favarato)，任职后不久即调回罗马。1941年起便由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马冀笃(Petrus Maleddu)为代理监牧主教，1949年罗马教廷正式委任马冀笃为安康教区第四任监牧主教，此时约有教徒3000余人。<sup>③</sup>

安康监牧区在总堂办有修道院、拉丁语学校、医院、保稚院、残老院、教会小学，

<sup>①</sup> 陕西省政协存：《陕西地区天主教历史汇编》。

<sup>②</sup> 西安市档案馆藏：《西安天主教会调查报告》。

<sup>③</sup> 陕西省政协存：《陕西地区天主教历史汇编》。

在各县也建有教堂和诊所。

自陕西代牧区区分为汉中、延安、西安、盩厔、凤翔、同州、安康和三原 8 个教区后，教务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 1933 年统计，全省共有教徒 62054 人，<sup>①</sup>到了 1949 年已经增加到了约 12 万人，人数增长了近一倍。<sup>②</sup>方济各会把持着其中 7 大教区的教务活动，因而直接影响整个陕西天主教的发展状况。

## 第二节 天主教西安南堂概况

天主教西安南堂又称方济各主教坐堂，是天主教西安教区的主教坐堂，位于西安市五星街（原土地庙什字）。它是方济各会建立并发展的代表性教堂，时至今日依旧是陕西天主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天主教西安南堂是由陕晋教区第一任主教梅书升，于 1716 年（康熙五十五年）购置，后由方启升主教所建造。雍正皇帝禁教期间，南堂被官府没收，卖给三户居民。1861 年，陕西代牧区（1849 年，陕晋代牧区分化为陕西代牧区和山西代牧区）主教高一志（Ephesus Costantini）和助理主教林奇爱（Amatus Pagnucc）与清政府交涉，落实原天主教教产。1865 年，归还南堂正厦房 158 间，恢复宗教活动。1883 年，方济各会在原址的基础上重建教堂 12 间（祭台 3 间、堂 8 间，堂面 1 间），堂面高 17.45 米，教堂占地面积 700 多平米，教堂建筑以西欧罗马式与中国宫殿式相结合，用砖、木、石材料建成，堂内外既有雕刻，又有壁画，属于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南堂总面积占地 20.16 亩。1900 年前后，法籍穆理思（Gabriel Morao）神父（他于 1908-1915 年任陕西关中教区主教）曾在南堂传教。德籍胡定邦（Atanasio Goethe）神父任陕西关中教区主教期间（1904-1908 年在任），将南堂修葺一新，欲将主教府从高陵通远坊迁至南堂未果。他 1908 年病逝，葬于此堂。1930 年，戴夏德（Florentius Tessiatore）主教将陕西中部代牧区主教府由高陵通远坊迁至西安南堂，此后，西安成为陕西关中地区传教中心。1932 年，三原、盩厔、凤翔和同州（大荔），先后从西安代牧区划分出去，西安代牧区只负责管辖西安、长安、临潼、蓝田、商县、丹凤、洛南等地区的教务。1946 年，西安代牧区升格为总主教区，南堂便作为西安总主教区主教座堂。<sup>③</sup>

<sup>①</sup>《一九三三年中华全国教务统计》，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务馆，第 19 页。转引自王霄：《基督教与陕西》，第 237 页。

<sup>②</sup>西安市档案馆存：《西安天主教会调查报告》。

<sup>③</sup>“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教职人员被捕，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南堂被西安糖果厂占用，教堂的标志——“十字架”被拆毁，教堂被作为糖厂库房使用，得以保存。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1981 年，西安市党委和政府将南堂归还教会，天主教重新恢复宗教活动。南堂落实后，教堂被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因教堂被糖果厂占用期间，在教堂两边搭建住房，使教堂受到一定的损坏，教会在政府文物部门的支持下，于 1988 年和 2004 年两次对教堂进行了全面维修。南堂是陕西省天主教爱国会、省教务委员会和西安市天主教爱国会所在地。

南堂教会组织包括：1、修女院，1907年方济各圣母会修女（1890年至陕西）来西安传教，在南堂设立修女院。1925年耶稣圣心方济各传教修女会（1923年成立于通远坊）在南堂设分院，1928年设总会院于南堂。2、孤女院，教会开办于清末，由圣母会修女管理孤女院。3、养老院，教会于清末设立，由圣母会修女管理。4、1948年开办玛利诊所，解放后政府改为莲湖区红十字会医院。5、媒体，西安教区先后办有《益世报》（西北版）、《教友生活周刊》和教会电台等传媒机构。6、学校，1911年方济各圣母会修女在西安南堂为孤儿办初级小学，称“玫瑰女子小学”。1919年南堂司铎西班牙籍丁午桥神父在该校设立中学部，名为“玫瑰女子中学”。

### 第三节 陕西方济各会会士小传

方济各会是陕西天主教传播的重要力量，对陕西天主教事业影响深远。作为具体政策的实施者，方济各会会士在天主教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直接作用，下面选取民国时期在陕西有代表性的方济各会会士作一介绍，以期从侧面反映这一时期天主教在陕西传播的历史面貌。

希贤（Eugenio Massi, 1875-1944），意大利人，1903年来华传教，1910年任山西太原教区主教，1916年来陕，改任陕西中部代牧区主教，任职12年。1923年，希贤在通远坊创立了“耶稣圣心方济各第三修女会”，这是一个中国籍修女的修会，也称“黑衣修女会”。1925年起，希贤除管理西安教务外，还被任命为汉口的宗座署理，两年后升任宗座代牧。从1925年10月至1928年2月，西安代牧区的教务工作交由他的副代牧范济各（Francensco Saccani, 1865-1932）管理。希贤在陕期间，陕西军阀割据。希贤一方面组织武装自保，一方面与当时陕西各派军阀交好，在当时军阀混战的状况下，通远坊相对安全，成为一处避难所。

戴夏德（Florentius Tessiatore, 1892-1932），意大利人，西安代牧区主教。1915来华，传教于山西广灵等地。1916年随新任命的陕西关中教区主教希贤由晋入陕，在高陵通远坊天主堂任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院长。1920年，他在通远坊修建气象台，预报天象和气候变化，为当地民众提供便利。他精通物理和机械学，尤精通电学，把工业发达的欧洲国家的一些重要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地动学、天文气象学、机械学、电学等列为教徒学生的课程，在通远坊修道院安置自动发电机，设置地动仪，监测地球变动。1928年，戴夏德被罗马教廷任命为西安代牧区主教，任职3年有余。他于1930年将主教府迁于西安南堂，西安成为关中地区的教务中心。正值他筹划将关中教区划分



为西安、整屋、三原、同州 5 个教区之际，染伤寒病卒于通远坊。

万九楼（Julius Vanni, 1893-1976），意大利人，西安代牧区主教。1930 年来陕，1932 年接任戴夏德成为代牧区主教。在其任期内，三原、同州、整屋、凤翔先后从西安代牧区分离独立。1933 年建立德莱神学院，将圣方济各第三修会总院设于西安南堂。并在西安开办教会学校玫瑰女子中学和小学、若瑟男子小学等，另建有教会医院安多医院、玛亚诊所等机构。1946 年，西安代牧区升格为总主教区，万九楼出任第一任总主教。

班锡宜（Fulgentius Pasini, 1897-1985），意大利人，1931 年 6 月 4 日，被任命为三原监牧区第一任监牧主教。1925 年 11 月来到高陵通远坊，历任大、小修院教授、院长，在任职期间，激起学生多次抗议，被迫辞职。后又任神学院院长之职直至监牧主教。1944 年 12 月，三原监牧区升格为代牧区，班锡宜出任首任代牧主教。在任期内，在三原辕门巷购买大片土地，建立教堂，扩张教会势力。解放后，被驱逐出境。<sup>①</sup>

易兴华（Cae Ibanezy Aparicio, 1873-1951），西班牙人，陕西延安代牧区第一任主教。在延安地区进行传教活动长达 30 多年，建立教堂于延安附近的桥儿沟，并办有小修院 1 所，培养了国籍神甫 30 多名，建立了延安教区总堂，创立了修院、孤儿院、小学、经言学院等机构。传教工作较有成效，除了府谷、清涧、吴旗、宜川外，天主教已经传播到陕北的大部分地区，最为兴盛的时期有神甫 30 余人，大、小教堂 50 余处，教徒近万人。<sup>②</sup>1949 年，易兴华返回西班牙。

丁午桥，西班牙人，1914 年来陕西中部代牧区传教，曾任西安南堂神父，管理玫瑰女子小学。1919 年丁午桥在小学校设立中学部，名为玫瑰女子中学。1923 年协助希贤主教为陕西国籍修女创立耶稣圣心方济各传教修女会。在 1927 年西安“非基督教运动”中，学生把他抓捕押往第一师范，后得以释放。1932 年，陕西中部代牧区分化教区后，随西班牙籍传教士转入延安代牧区。他被延安代牧区主教易兴华（Cae.Ibanezy Aparicio）安排住上海，管理代牧区财务，负责代牧区在上海的房地产、代牧区与罗马教廷和方济各总会的教务及财务事宜。1949 年被任命为延安代牧区副主教。1952 年被驱逐回国。丁神父的生卒时间及回国后事迹不详。

米良（1911-1966），意大利人，天主教神父兼音乐家。1930 年来陕西传教，1948 年 11 月任西安代牧区署理主教。米良神父精通音乐，曾任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音乐教

<sup>①</sup> 陕西省政协存：《陕西地区天主教历史汇编》。

<sup>②</sup> 李大海、吴宏歧：《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过程时空特征分析》，载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 01 期。

师兼西安音乐学院客座教授，他为神哲学生讲授音乐，同时也为教友教唱圣歌，又将音乐学院学生领来教堂演唱弥撒等。他擅长音乐创作，曾作有天主教《弥撒曲》、弥撒前后曲、领圣体前后经、圣母及圣人等圣教歌曲很多部，教徒将他所创作的歌曲称为“米良曲”，1948年出任西安总主教区主教。

#### 第四节 方济各会对陕西社会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后，方济各会利用清政府的赔款，不仅把许多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毁、损坏的教堂重新修建起来，而且还新建医院、学校和一些文化慈善机构，传教手段更加多元化，以此达到推进天主教传教工作的目的。

方济各会在陕西建立了很多教会学校，如若瑟男子小学、三德小学等，这些学校设立的宗旨是对青少年从小熏陶宗教信仰，使之逐步发展成教徒。西安代牧区主教万九楼向方济各总会会长报告说：“我一直都设法维持所有的小学和中学开放，因为这都能使人敬仰天主教会，并能成为吸引许多人灵魂的方法。”<sup>①</sup>方济各会并首开女子教育之先河，提倡男女平等先进的教育理念。1911年创办了“玫瑰女子小学”，后在此基础上扩大了中学部，即“玫瑰女子中学”。据统计，截止1949年，方济各会在西安主教区共建有小学15所，学生达到1676人；三原主教区建有小学6所，学生521人；同州监牧区有小学5所，学生135人；延安主教区有小学3所，学生56人；凤翔主教区有小学3所，学生175人。<sup>②</sup>这些教会学校客观上促进了陕西近代教育的发展，提高了民众素质。

医药卫生作为传教的有效手段也被教会广泛使用。方济各会在陕西的教堂都设有一般的医疗设施，它实行免费医疗，这对贫苦的民众是很有吸引力的。很多传教士兼任医生，在给病人解除病痛的同时宣讲教义发展教徒。随着教会势力的不断增强，方济各会还在不同教区建立了专业的正规化医院，借此扩大教会的影响，吸引更多的信徒，促进教务的发展。如西安圣安多尼医院、天主教大荔广慈医院、天主教宝鸡圣本笃医院等，这些医院都设有多个科室，门类齐全。到1949年，方济各会在西安主教区建立医院1所（圣安多尼医院），有病床100张，诊所12间；三原主教区有医院2所，病床62张，诊所4间；同州监牧区有诊所4间；延安主教区有诊所1间；凤翔主教区有医院1所（圣本笃医院），病床30张，诊所3间。这些机构的设置，在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陕西，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慈善事业也是方济各会教务活动的重要内容。1934年，耶稣圣心方济各第三修女

<sup>①</sup>（荷）金普斯、麦克罗斯基著，李志忠译：《方济会来华史（1294-1955）》，第91页。

<sup>②</sup>（荷）金普斯、麦克罗斯基著，李志忠译：《方济会来华史（1294-1955）》，第111页。

会在西安开办了 1 所孤女院，收容孤儿 70 人。另外，方济各会在高陵通远坊还设有 1 所孤女院，1 所残障院，收容孤儿 61 人，男女残疾人 38 人。在同州监牧区 1935 年建有孤儿院 1 所，收容孤儿 12 人。在延安教区 1939 年建有孤儿院 2 所，收容孤儿 28 人。在凤翔教区 1946 年建有孤儿院 1 所，收容孤儿 73 人。

中日战争爆发后，方济各会在所有天主教机构都设立了中立的难民区，特别为老人和儿童。数以百计的人居留在难民区寻求庇护。西安代牧区主教万九楼出任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募集善款，保护平民。方济各会的这些慈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同时也提高了教会在民众中的声望。

方济各会通过兴办学校、开设医院、推广慈善事业等手段推进教务发展，客观上，成为推动陕西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鸦片战争后，方济各会在陕西的活动已经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传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工具。西方传教士依托不平等条约，在武力的庇护下，强行进入中国社会，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渗透，他们与殖民扩张活动密切配合，逐步将中国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近代频发的教案集中体现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每一起教案几乎都与列强侵略、渗透有关，而要实现双方正常的交流，则必须以平等的政治关系作为保障。

## 结 语

纵观天主教方济各会从 1696 年入陕到 1949 年，这 200 多年的时间里，可以看到方济各会的传教工作保持了天主教在陕西传播的连续性。在这个历程中，方济各会尽管传教规模有限，但它对陕西社会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礼仪之争”后，耶稣会失去罗马教廷的支持，在陕西的势力急剧下降。1696 年，陕西代牧区正式成立，方济各会接手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播工作。清朝实行禁教期间，陕西方济各会士一直进行秘密传教活动，陕西代牧区第一任主教叶宗贤将传教总堂设在三原附近的鲁桥镇发展教务。1705 年，由于教牧人员缺乏，山西并入陕西代牧区，改称陕晋代牧区，梅书升成为陕晋第一任主教。陕晋代牧区主教同时兼管甘、青等西北地区及湖、广的教务工作，势力辐射地区达十省之多。“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传教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方济各会利用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条款”，置办田产，建成通远坊传教基地，使之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天主教传教中心。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关中地区生灵涂炭，人口损失近半，时任主教的高一志与回民起义军首领关系密切，回民义军不杀在教（天主教，笔者注）之人，陕西天主教徒得以保全。许多普通民众为了保全性命，纷纷加入天主教。1878 年，陕西发生大旱，灾情严重，饿殍遍野，大量灾民流离失所。方济各会组织灾民修建通远坊城墙，出粮赈济，规定领取粮食的时候必须立誓入教，并保证永不退教，陕西天主教徒人数急剧增加。义和团运动中，陕西发生了几起教案，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方济各会领导下的陕西大部分教区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义和团运动后，方济各会适时改变传教策略，兴建学校、创办医院、推广慈善事业等，传教手段多元化。这些活动的宗旨是为传教工作服务，但客观上却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陕西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民国时期是陕西天主教快速发展时期，原有教区发展分化成新的教区。1911 年，陕西北部代牧区（1887 年成立）分化为陕西中部代牧区和陕西北部代牧区。1924 年，经罗马教廷批准，陕西中部代牧区更名为西安代牧区，后分化出三原监牧区（1931 年）、同州监牧区（1935 年）、盩厔监牧区（1932 年）、凤翔监牧区（1932 年）。陕西南部代牧区（1887 年成立）更名为汉中代牧区，后分化出兴安监牧区（1928 年，后改名安康监牧区）。同年，陕西北部代牧区更名为延安代牧区。至此，陕西天主教八大教区格局初步形成，除汉中教区由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会和米兰外方传教会管理，其它七个教区均由方济各会领导。

方济各会在传教过程中没有像耶稣会走精英路线，争取以士大夫为主的社会统治阶层的传教策略，而是深入中国社会最底层，接触广大民众，把传教的重点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使之成为传播天主教的基地。这正是方济各会赖以在陕西长期传教的根本。方济各会来华传教初期，对耶稣会实行的“文化适应”的传教方式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适应和不适应的问题，认为任何先于耶稣基督之前的东西都是迷信和偶像崇拜，都是在中国推进福音化的障碍，在宣传基督教义之前必须彻底摧毁它们。<sup>①</sup>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礼仪之争”的问题上，方济各会一开始站在耶稣会的对立面，但是随着方济各会在传教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层面，尤其是接触到广大的农民群众，深刻了解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后，他们的立场和传教策略与方法逐渐发生了变化，放弃最初那种苦行僧般的传教方式，采用适应中国社会的传教策略，他们的说教开始逐渐被中国普通民众接受，传教事业也因此有了较大的发展。

方济各会传教的重点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更多面向的是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在《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团省规》<sup>②</sup>第19条规定：“应告诫全体传教士要全心致力于乡村传教团的工作，因为很明显在那里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可以摆脱各种各样的阻碍，更好的播下福音的种子。”可以看出方济各会传教对象是非常明确的。以利马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传教路线是从城镇逐渐向大都市发展，最后抵达中国的都城，他们尝试借助中国皇帝和宫廷士大夫们的权利，由上至下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因此他们一开始主要把中国的士大夫和文人阶层看作传教的主要对象，试图通过走上层路线推进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而方济各会则是面向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大众，这种传教路线与耶稣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也正好反映了方济各会所坚持的“清贫福音”的原则。

耶稣会走上层路线，采取了“文化适应”和“科学教育”<sup>③</sup>的迂回方法，试图入境随俗，用欧洲的文明和科学来教化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然后再通过他们来接近中国最高权利的代表——皇帝，以此来推动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如果成功则可以以行政命令迅速将中国转变为天主教的王国。但如果失败，则必然会引起宫廷内反对势力的驱逐和禁止。“中国礼仪之争”后，耶稣会的遭遇就集中体现出了这一点，最终导致了全国的外国传教士及其教徒都受到了牵连，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进程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方济各会是从社会底层的民众和农村地区开始传教活动，由于其传教地域的广大和教徒众多，通

<sup>①</sup>（意）柯毅霖著，王志成、汗建达译：《晚明基督论》，第91页。

<sup>②</sup> 1678年5月17日于马尼拉召开的方济各传教士大会制定。转引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博士论文），暨南大学，2004年10月，第251页。

<sup>③</sup>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第19页。

常能够躲开官府，避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和对抗，在禁教期间，传教士和教徒们或隐匿于山林，或隐匿于信徒家中进行秘密传教活动，再加上很多教徒世代信奉天主教，他们的子女一出生即入教，官府的禁教行动很难彻底消除天主教的影响。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当方济各传教士在各地受到官府的驱逐或遭遇官兵的追赶时，往往会得到中国教徒的帮助，使得他们可以躲避风险，安全的生活在中国的教徒中间。因此，陕西的天主教活动虽然屡受打击，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天主教在陕西的根基没有动摇。

陕西方济各会的传教活动历经清禁教时期的低潮、鸦片战争后的快速发展、民国时期的深入扩展等不同阶段，到1949年，在陕西共发展天主教徒约12万人。<sup>①</sup>如果说耶稣会是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主力军，那么方济各会则是天主教在陕西传播的主力军，他们的传教活动，保证了天主教在陕西地区的持续发展。

---

<sup>①</sup> 西安市档案馆存：《西安天主教会调查报告》。

## 附录

龚振铎德教碑<sup>①</sup>

碑圆首，通高 120 厘米（首高 35 厘米），宽 51 厘米，厚 15 厘米，上镌天主圣号。该碑为中、拉两种文字写成，文意相同。拉丁文横书，6 行；汉文楷书竖行 7 行，满行 8 字。碑身完好无损，字迹清晰。

录文如下：

钦命法国驻札中国陕西传教圣方济各会士振铎龚公老夫子德教碑

公姓龚，名山林，字野夫，本名赖期泰西意国人也，公性纯笃，家寒俭，早年弃俗潜修，甘贫乐道。年甫弱冠，于超行立命、格物穷理之学融会贯通，送履受司铎。矢志遨游，航海西来，宣传圣教，即以死而后已自任。此得之传闻，故约略不祥。据道光戊戌来华抵晋。闻秦中，圣教时际艰难，振铎寡音，公心怀悲悯，艰险不避，于己亥即入 陕矣。当此困厄之秋，有司草禁，关津稽查，而公辄潜迹消光，藏踪匿形，往来三秦，施教不倦。所到之处，抚慰教化，诚意恳挚，而以一片哀矜体恤、慈祥惻怛致心，沦肌浃肤，倾心归化者已爱戴不啻如父母矣。逾数年，乙巳，上司命召教读被化之民，把袂流涕，每恋恋不舍去。越六年，岁庚戌，秘传教郾、颍、榆、延，人地苦寒，公辄解衣推食，时济贫乏。未半载召归时隆冬，公仅以单袷遮体耳，其哀矜贫人类如此。至咸丰丁巳，禁革稍宽，公愿颇舒矣。随处传教，虽空囊束手，即庇材鸠工，启造建圣堂，百计营谋，不知若何作用，皆落成告竣。如此者不下十数。渭南县卢董大堂，其首巨观也。迹时，至今籍籍传闻云。及后，建崇堂大堂，立圣体会，今虽壮丽可观，然皆自公开端创始焉。越庚申，南走汉中，抵，有厅尹某者，严加禁查，搜有经像诸物，遂以外国人不准内地往来，转详当道。文下，例免治罪，解发原籍。厅尹押送，沿途艰苦万状，笔难述，而公辄自慰曰：此正吾为天主立功之秋，毕生难逢。毫无怨尤，终与厅尹非微语言无犯，而辞色亦为尝假。其立心为何如耶。厅尹当悔莫及，愧无地矣。至粤东，幸会我朝与法人睦友邦，约盟和好，恩准西士传教。而厅尹自恐报复，战栗惊惧，更不知若何自悔自愧耶。公不但怒之，而且护之。不但护之，而且送之，送二日，别若故交。其爱人何如耶。又粤北上，令照归陕，已在咸丰辛酉是以粘液。无何，同治壬戌、癸亥，贼匪西，与其徒数十人推比终南，饮食起居，甘苦与共，然教诲之功，未尝废弛也。公性情温和，神气凝静，举止方正，度从

<sup>①</sup> 董国柱编：《高陵碑石》，第 88-91 页。

容。其教也宽□而严，其课功也勤而敏。且于诸生性有不驯者，徐以□之情；有不通者，曲以□之□。激励裁抑，诱掖奖劝，无不周至，□之门，翕然均沐时雨春风之化矣。无思不服□，即半途中止者，亦甘心之咎，没齿无怨，至其学精品粹，得垂名芳，慕敬□上，廉洁持身，慈恩待人，逊让接物，又不胜数。以□光绪癸未，居华四十六年，教授生□徒忌三十余载，承教者约数百人，成就司铎者已不下数十人矣。积劳成疾，卧病教读。上司以年老，养疾省垣，因别语诸生曰：而今日后，各勤尔业，各尽尔□心，恐再不能晤对一堂矣。言讫，泪下数行沾襟。诸生亦呜咽伏地，恸不能言。伤何如哉。呜呼！公竟于是年三月初三寿终正寝，恩诏上昇爰归葬圣坟四方教民自着哀麻几数百人迎丧扶柩与数十里如丧考妣，哭声震野，睹者莫不叹息，咸不忍闻，非德感之深乌足以致此哉。距生于救世后一千八百一十一年，卒于一千八百十三年，享寿七十有二。仆於以西舌腭教堂诸门生言念及公辄潜潜泪下，因思其德，欲勒石以誌永久，持状请文。仆固浅陋，何敢为文，然以公之德素所仰望恨不获瞻拜门下，今犹得操周撰公之行，托名不朽，未始不为幸也。铭曰：维彼西天生此儒硕皇天眷顾，载持教铎多士，奋勇教铎之功，考德序维持之于公，顾瞻尔公，群贤之夙，权衡自持，泳暨自守，大道皇皇，誕告四方，不虛不伪，圣谟洋洋，竭心殫力，意极广养笔美人兮，善成天性，卓彼先觉知止有定惟有好德寿考终命史也，作铭直也匪佞岷山之碑，庶几与之相泣，钦命法国驻扎中国总理西教务之主教笪 准

受业：岐山 王保禄，城固 左尔定，山西 王增爵，周至 刘若瑟，高陵 李祥清，岐山 王能定，三原 王庭愚，城固 张全恩，武功 祝仲文，周至 田自愚，城固 张方济，临潼 王尽孝，兴平 张多默，凤翔 王保禄，三原 吕克毓，武功 李宣，岐山 刘眷西，武功 焦义龙，户邑 高尚志，渭南 张士旗，山西 王德中，周至 赵奥定，城固 张伯禄，周至 刘磐石，勉县 黄金书，长安 周万崐，渭南 徐敬业，户邑 田致福，长安 顾善述勒石

户邑儒学犹增广生员教后学高望贤 顿首拜撰

同治銜吏部候选县丞皋蘭沐恩张瑛 顿首书

大清光绪十一年岁次己酉三月上巳日 立



## 附录二

陕西代牧区、陕晋代牧区、山陕湖广代牧区、湖广代牧区、山西代牧区主教、助理主教、署理主教列表<sup>①</sup>：

姓名	代牧区	会籍	出生时间	晋牧的时间(年) /地点/主教	死亡时间/地点	备注
叶宗贤	陕西代牧	方济各会	?	1696年	1704.7/陕西	未祝圣
梅书升	陕晋代牧	方济各会	1668	1717.6/北京/伊大仁	1727.12/西安	祝圣前为陕西代牧
方启升	陕晋代牧	方济各会	1679	1730/四川/穆天尺	1741.12/渭南	祝圣前接管教务
高乐道	陕晋代牧	方济各会	1668	1732.11/西安/方启升	1738.1/绛州	山陕助理主教
李乐德	山陕湖广	方济各会	1699	1740年/西安/方启升	1756.12/新绛	?
黄多默	山陕湖广	不入会	?	1753/为李乐德选的助理主教未祝圣	1761.8/陕西	中国神父
步奥才	陕晋代牧	方济各会	?	1753/新绛/李乐德	1765.11/澳门	被逐澳门
路补来	山陕湖广	方济各会	?	1756/始代理教务至1762年	1762.9/汉中	未祝圣
李成功	山陕湖广	方济各会 住院派	1699	未祝圣署理代牧区	1761.8/陕西	诏书未到
方济各	山陕湖广	方济各会 住院派	1723	1765.8/河南/南怀仁	1785.2/北京	1777年辞职后两任辅理主教

<sup>①</sup> 上表据高陵通远坊教会碑石制成。排列以代牧主教任职时间先后为顺序。李文秀、杜约理属于陕晋代牧区分区前，在陕西的教士，故亦列入。

闵而才	山陕湖广	方济各会 住院派	1733	1778.1/西安/方济 各	1780.8 /太原	?
康安当	山陕湖广	方济各会 住院派	1741	1781.2/西安/方济 各	1785.2 /北京	死于监狱
金乐丽	山陕湖广	方济各会 住院派	1726	1789.4/北京/汤士 选	1790.4 /襄垣县	煤气中毒死
郭儒旺	山陕湖广	未入会	1743	1785-1889/署理	1817/山西	以年长神父 代管
伊物华	山陕湖广	方济各会	?	任命书到时已处 临终	1791.12 /北京	未圣未来代 牧区
吴耀汉	山陕湖广	方济各嘉 布遣会	1746	1794/四川	1804.6 /新绛	1800年 停职
康福德	宗座巡视	未入会	?	1800/以巡视员署 理	?	1804年被逐
路类思	山陕湖广 代牧	方济会嘉 布遣会	1749	1804/新绛 /吴耀汉	1804.10/洞儿沟	?
金雅敬	山陕湖广	方济各嘉 布遣会	1765	1817.2.17/北京/ 毕学源	1843.9/祁县	1815年接管 代牧区
伍月旺	山陕湖广	方济各会		1823.6.22/祁县/ 金雅敬	1828.8 /汉中	为金氏助理 主教
冯尚仁	山陕代牧	方济各会	1804	1835.9/祁县/金雅 敬	1848/?	1843年前为 助理,后主教
李文秀	湖广代牧	方济各会	?	1840.7.19/祁县/ 金雅敬	?	?
杜约理	山西代牧	方济各会	?	1845.6.13/文水/ 冯尚仁	?	?

## 附录三

清末陕西各代牧区主教、助理主教及署理主教表<sup>①</sup>

区名	姓名	修会名	国籍	生卒年代	职称	祝圣时间 (年)/主教/ 地点	任职时间	备注
陕西、 陕西 北部 代牧 区	高一志	方济各会	意大利	1805- 1884	主教	1847/冯尚仁/ 通远坊	1849-1884	死葬于通远坊
	林奇爱	方济各会	意大利	1833- 1901	助理、 主教	1866/高一志/ 通远坊	1866-1901	死葬于通远坊
	魏比约	方济各会	意大利	? -1904	助理	1887/林奇爱/ 通远,因病回 欧	未任职	死葬于意大利
	郭德礼	方济各会	意大利	1865- 1901	助理	1900/林奇爱/ 通远坊	1900-1901	死葬于通远
	聂长春	方济各会	意大利	? -1901	助理	1901/被任命 时已死	未任职	死葬于通远
	何理熙	方济各会	意大利	1858- 1905	主教	1902/山西太 原	1902-1905	死葬于法国
	胡定邦	方济各会	意大利	? -1908	主教	1905/德国	1905-1908	死葬于西安南堂
	穆理思	方济各会	法国	不详	主教	初以神父身 份管理监牧 区	1908-1915	死葬于法国
陕西 南部 监牧	瑞良	伯多禄圣保禄	意大利	不详	监牧	以神父身 份管理监牧 区	1887-1889	不详

<sup>①</sup> 上表据高陵通远坊教会碑石及李崇正《汉中地区天主教会简介》(载于《汉中教区若瑟修院庆祝金庆(50周年)纪念册》，1947年版)制成。

区、 代牧 区	安廷相	同上	意大利	不详	监牧	以神父身份 管理监牧区	1889-1895	因病辞职回 欧
	拔士林	同上	意大利	? -1918	主教	1895 /林主教/ 西安	1895-1918	死葬于汉中 古路坝
	韩默理	圣母 圣心 会	荷兰	1840- 1900	主教	1878/任甘肃 主教	1888-1900	死于义和团 教案
	闵玉清	圣母 圣心 会	比利时	1853- 1915	主教	1902/包主教/ 北京	1902-1915	死于缸房营 子

## 附录四

民国时期陕西各教区主教（监牧）、署理主教表<sup>①</sup>

教区	姓名	国籍	修会	生卒时间	来教区/离 去时间	任职时间	备注
关中	希贤	意大利	方济各小 兄弟会	1875/1944	1917/1928	1917/1928	主教
	戴复德	意大利	同上	1892/1932	1917/1932	1928/1932	主教
西安	万九楼	意大利	同上	1893/1976	1930/1948	1932/1948	主教
	米良	意大利	同上	1911/1966	1930/1950	1948/1950	署理
三原	班锡宜	意大利	同上	1897/1985	1925/1952	1932/1952	主教
同州	穆继文	意大利	同上	1888/1970	1932/1952	1931/1952	监牧
	倪秉谦	意大利	同上	1888/1961	1932/1952	1946/1947	署理
盩厔	张指南	中国陕西	不入会	1867/1940	1909/1940	1932/1940	监牧
	高止一	中国陕西	不入会	1901/?	1927/?	1940/1951	监牧、 代牧
凤翔	王道南	中国山西	方济各小 兄弟会	? /1949	1932/1949	1932/1949	主教
	王世光	中国山西	方济各小 兄弟会	1906/1975	1933/1975	1949/1950	署理
	周维道	陕西扶风	方济各小 兄弟会	1905/1983	1932/1980	1950/1983	主教
汉中	康道华	意大利	罗马伯多 禄保禄会	?/1925	? /1925	1919/1925	主教
	得路高	意大利	同上	?	1919/?	1925/1929	署理
	巴明善	意大利	米兰外方 传教会	?	1929/1934	1929/1934	主教
	祁济众	意大利	同上	?	1935/1946	1935/1946	主教

<sup>①</sup> 关中、西安、三原、人荔、凤翔、延安教区据李志忠译《方济会来华史》整理制成；汉中教区据李宗正《汉中地区天主教会简介》制成；安康监牧区据《安康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制成。

	孟守道	意大利	同上	?	?/1952	1946/1952	主教
兴安	苏辑五	意大利	方济各住 院会	1925/1929	1925/1929	1928/1931	监牧
	巴南初	意大利	同上	1925/1940	1925/1940	1931/1940	监牧
兴安	马冀笃	意大利	同上	1901/?	1925/1952	1949/1952	监牧
	方万道	意大利	同上	?	? /1947	1940-1947	监牧
	白慕理	意大利	同上	1901/?	1925/?	1947/1949	署理
延安	易兴化	西班牙	方济各小 兄弟会	1873/1951	1911/1949	1911/1949	主教
	曾得胜	西班牙	同上	? /?	1928/1953	1949/1953	署理

## 参考文献

1.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2. 《清仁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3. 《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4. (清)黄伯禄：《正教奉传》，光绪十六年印(1890年)，上海慈母堂藏版。
5. 中国第一档案馆编：《清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中华书局，2003年版。
6. 中国第一档案馆编：《清末教案》，中华书局，1996年版。
7. 西安市档案馆存：《西安天主教会调查报告》。
8. 陕西省政协存：《陕西天主教历史汇编》。
9. 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
10. 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第十七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 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 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3. 张贵永编：《教务教案档》，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80年版。
14. 杨虎城、邵力子编：《续修陕西通志稿》，(铅印本)，1933年版。
15. 成维雍编：《高陵县续志》，(台北)成文出版社，2007年版。
16. 李崇正编：《汉中教区若瑟修院庆祝金庆(50周年)纪念册》，1947年版。
17. 陈芑芬编：《宁羌州乡土志》，(铅印本)，燕京大学图书馆，1937年版。
18.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高陵县志》、《镇巴县志》、《西乡县志》、《勉县志》、《丹凤县志》、《安康县志》、《合阳县志》、《凤翔县志》、《临潼县志》、《子洲县志》、《黄陵县志》、《米脂县志》、《榆林市志》、《紫阳县志》、《延长县志》、《蓝田县志》、《兴平县志》、《耀县志》、《户县志》、《周至县志》、《华阴县志》、《宜川县志》、《靖边县志》、《洛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院，1987年版。
20.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
21.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

22.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23.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版。
2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25. 古伟瀛编：《塞外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2002 年版。
26. 罗秉祥编：《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27. 任继愈：《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
28.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
29.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 年版。
30. 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年版。
31.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32. 王雪：《基督教与陕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
33. 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版。
34.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版。
35. 夏春涛：《教案史话》，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
36. （英）阿·克·穆尔著，郝振华译：《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5 年版。
37. （法）沙百里著，耿昇、郑德弟译：《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38.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7 年版。
39. （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
40. （美）苏尔·诺儿编，沈保义、顾卫民、朱静译：《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1645—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41. （荷）金普斯、麦可罗斯基著，李志忠译：《方济会来华史（1294—1955）》，香港方济会，2000 年版。
42. （法）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43. （意）柯毅霖著，王志成、汪建达译：《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44. （法）谢和耐著，于硕等译：《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45. 汤开建：《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载自《纪念利马窦进京 400 周年国际



学术会议论文集》，宗教出版社，2003.9。

46.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博士论文），暨南大学，2004.12。
47. 王欣瑞：《基督教与近代陕西社会》，《西北大学学报》，2001.1。
48. 王欣瑞：《近代基督教传入陕西及农民入教原因探析》，《西北大学学报》，2004.1。
49. 王雪：《明末清初的陕西天主教》，《唐都学报》，2007.1。
50. 张晓虹：《同治回民起义与陕西天主教的传播》，《复旦大学学报》，2002.1。
51. 张晓虹：《陕西天主教教区的初步研究》，《九州学林》，2005·夏季（三卷二期）。
52. 汤开建、马占军：《晚清天主教在陕西三边的传播》，《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4。
53. 王静：《20世纪初陕西三大教案》，《西北大学学报》，2001.1。
54. 赵玉华、刘凌霄：《清末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异同》，《山东大学学报》，2003.1。
55. 刘建平：《近代天主教在陕西八个教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天主教》，2007.4。
56. 贾二强：《明末清初陕西的传教士》，《文史知识》，1992.6。
57. 李伯毅：《西安市糖坊街天主教沿革史》，《中国天主教》，1995.5。
58. 李伯毅：《天主教南堂沿革史》，《中国天主教》，1996.3。
59. 陈青松：《雍正时期的禁教与禁教时期的天主教》，《暨南大学学报》，2007.4。
60. 李大海、吴宏岐：《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过程时空特征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1。
61. Kenneth Scott Latoure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Lillan Company, 1929.
62. Ralph R.Covell, *Confucius, the Buddha, and Christ : A History of the Gospel in Chinese*, Maryknoll : Orbis, 1986.
63. Bob Whyte, *Unfinished Encounter : China and Christianity*, Glasgow : Collins, 1988.

## 致 谢

回首三年的研究生生涯，我收获丰硕，感慨良多。求知道路上的每一步前行，都会使自己的心智和行为趋向成熟，以更加独立和理性的心态去面对社会和人生，毕业论文的撰写更是坚定了自己求知无悔的信念。

首先，衷心感谢我的导师王静老师。本篇论文，大到题目的选定，框架的设计，小到写作的规范，标点符号的修订，无一不凝结着王老师的智慧与心血。从初稿到定稿，王老师五次精心修改，每一次都字斟句酌，去冗补漏。可以说，没有王老师的悉心指导，就没有本篇论文的完成。王静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执着的学术追求和正直无私的人格魅力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终身受益。

感谢西北历史研究所各位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吕卓民老师的儒雅和善，赵斌老师的博闻强记，海波老师的正直善良，李刚老师的认真细致，都让我感受到象牙塔里久违的单纯和美好。这段学习经历也将成为我人生最美好的记忆。

感谢我的师弟、师妹们，他们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满孝永师弟，他的率直、真诚让我感动；武士靖、李宪霞师妹的细心、热情，还有陈跃、陈钊、齐晓升、赵德文等师弟们，我只想说明能与你们同行，是我的幸运。

我还要感谢陕西宗教局的陈会龙先生，西安南堂的胡世斌神父以及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的关启文教授、罗秉祥教授，在我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他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理解和付出，使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2009年5月于西北大学